

【论 文】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一个批判性的评估¹

潘志平²

【摘要】1944年新疆伊犁发生暴动，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伊犁暴动，发生在一个特别的区域，即深受伊斯兰教影响且与苏联相毗邻的地区，发生在一个特别的时代，即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因此，这场暴动与苏联及本地的宗教势力存在着复杂的互动，集中表现在苏联暗地支持下的有宗教色彩的“绿色革命”，但本质上，这场暴动属于旨在分裂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范畴。“东突厥斯坦”思想源自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双泛”），而作为“双泛”之纽带，“扎基德”运动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直至1908年以前新疆还没有“东突厥斯坦”的概念，但民族主义者开始积极从国外引入“东突厥斯坦”概念和思想，并通过想象构建自己的突厥“nation”，而将中国视之为与自己完全无关的“汉人”（خىتاي）国家。民国以来，中华国民国家和国民意识一定程度的迷失，为这个“共和国”和“东突厥斯坦”运动的滋生提供契机。

【关键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三区革命 伊宁事变 双泛 扎基德运动

1944年夏秋，新疆政局剧变。统治十二年的“新疆王”盛世才被解职还未离去之际，8月17日，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在伊犁巩哈县（今尼勒克县）乌拉斯台打响了武装暴动的第一枪。10月7日，新任新疆省主席吴忠信就任第四天，巩哈县县城被攻破。11月7日，由苏联入境一支武装与巩哈游击队联合向伊宁发起暴动，经六天激战，攻占了伊宁市国民政府所有军警据点。11月12日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史称“伊宁事变”（西方和台湾学界）或“三区革命”（大陆和苏联学界）。

这一突发的历史事件，有着复杂的国内外背景，值得讨论的问题很多。有些问题原来争议很大，如它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英国学者福布斯（Andrew D. W. Forbes）就曾指出：“苏联尽管继续，而且一直地大声矢口否认”，“但至少有一次似乎说漏了嘴，那是在1967年5月14日，苏联塔什干电台维吾尔广播说，‘……在伟大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向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提供武器和受过训练的指挥员’”。³ 另一位英国学者泰勒（Christian Tyler）也提到：“起义军人穿着印有斯拉夫大写字母 ВТР 的军服，ВТР 表示 ‘Восточная Турк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⁴ 真正比较清楚解答这一问题，还需依据苏联档案的解密，俄罗斯学者巴尔明（Валерий А. Бармин）指出：“尽管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提到了苏联在组织这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但由于缺乏俄罗斯方面的档案资料，他们对这方面的论述始终含混不清”。他的结论是：“苏联领导人不仅在起义的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向起义者提供了物质和军事技术援助，派遣了教官，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的活动”，“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1944至1945年北疆三区起义运动的成功在许多方面取决于苏联全方位的积极援助”。⁵ 这类

¹ 原文刊载于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2014年第12月号。

² 作者为新疆大学文科基地、中亚研究院、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教授。

³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88.

⁴ Christian Tyler, *Wild West China: The Taming of Xinjiang*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5.

⁵ Валерий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гг.*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БГПУ, 1999), 8, 78, 84.

问题，不论站在什么立场，随着相关的历史档案的解密，事实会弄得愈来愈清楚。本文将由事件的性质入手，从中国大陆研究的困境、西方的视角、苏联的说教，以及“东突厥斯坦”运动的源流等几个方面，探讨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研究的相关问题，希望以此推动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暴动、事变还是匪乱、革命？

首先的问题是，1944年新疆伊犁发生了什么，或者说事件的性质是什么？

国民政府和新疆当局最初的反应是“伊犁匪乱”，或伊犁匪患，如吴忠信1944年11月9日日记中写道：“晨听于参谋长报告伊宁匪患近讯”。1944年11月21日，蒋介石身边的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在日记中写道：“伊犁匪患愈闹愈烈”。¹ 这些都是军政长官内部说法，后来公开场合使用中性的“伊宁事变”，并把事变发动方称为“伊方”。至今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回忆录中，还仍然沿用这些说法。² 究其原因，可能是在苏联驻迪化领事的斡旋下，1945年国民政府与伊方开启和平谈判，也就是说，政府怎会与土匪谈判？其实，事变发生之时虽有抢劫、强奸、杀人，但发动方立即“建国”，组建“临时政府”的各部，公布“国旗”，并通过了《政府宣言》³。更重要的是，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很快从前线报告中获悉，事变有苏联直接参与的背景。⁴ 因此，1944年伊宁发生的事变不是一般杀人越货的土匪行径，而是以分裂、独立为政治目标的武装行为。

“伊方”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Əhmətjan Qasimi）⁵称“这场为真理而进行的伟大斗争，在伊犁取得胜利。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民族解放革命的浪潮涌向伊犁、塔城、阿山地区，开始波及全省”。⁶ 伊方的另两位领导人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⁷（Ishakbek Mununof）和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⁸（Delilhan Sugurbaef）曾分别撰文“民族军是十一月革命胜利的坚强保卫者”、“在阿山庆祝‘11·12’民族解放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⁹。“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民族解放革命”、“十一月革命”、“11月12日革命”是当时伊方的自称，其中“革命”是关键词。“革命”译自西语的 revolution，是近代政治的产物。自古以来就有“造反”（rebellion）的说法。17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询问他的大臣：

¹ 参见齐清顺，“新疆‘三区革命’称呼考察——兼谈对有关问题的断想”，《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页83。另参见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320/1 新疆剿匪密件II，1944.10-1945.5。（藏台北，外交部档案资料处）

² 陈力：《伊宁事变纪略》，南京：正中书局，1948；张大军，《新疆近四十年变乱纪略》，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张达钧[大军]，《四十年动乱新疆》，香港：亚洲出版社，1956；张大军，“新疆伊宁事变与伪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成立及其溃灭”，载《新疆研究》，台北：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1964；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

³ 杜荣坤等，《新疆三区革命史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页59~60。

⁴ 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页157

⁵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1914~1949）出生新疆伊犁，1936年考入莫斯科东方社会主义劳动大学。1942年回国，因宣传革命被捕入狱。1945年10月作为暴动地区主要代表赴迪化参加和平谈判，在随后成立的新疆联合政府政府中被任命为副主席。1949年8月赴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假道苏联途中遇空难逝世。

⁶ 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为全省实现解放、自由、平等和民主政治而签订‘和平条款’——告全疆各族人民书”，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页33。

⁷ 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1902~1949），新疆乌恰人，曾赴苏联学军事，伊犁暴动后任民族军总指挥，1949年8月赴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假道苏联途中遇空难逝世。

⁸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1906~1949），新疆阿勒泰人，曾任伊方哈萨克骑兵团长、阿山行署专员，1949年8月赴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假道苏联途中遇空难逝世。

⁹ 《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页93~99、149~167。

这是否是一次造反。大臣答道：“不，陛下，这是革命”（Non, sire, c'est-une-revolution）¹。这位大臣不经意地开启了“革命”这一政治术语，并为它“成为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或神话做出了重要贡献”。² 自此以后，可说是激动人心的“革命”年代，就本世纪来说，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在中国则有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革命意味着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更意味着时代的变迁、思想的浪潮，其中有的有激情、有理想，有的却是妄想或臆想。也就是说，声称革命的并非都能推动社会进步。毛泽东是世纪伟人，但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看来，就称不上是有积极意义的革命。1944年伊犁的“革命”《宣言》第一二条就是：“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上永远消灭汉人统治”，“建立真正解放的独立共和国”³，“革命”的动机和行为，仅仅就是要将这块土地从中国分裂出去，要把汉人从这块土地消灭掉，这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这种“革命”不具有任何积极意义。

1945年10月15日，自称“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代表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一行三人赴迪化（乌鲁木齐），声称要与国民政府代表以同等地位交换“两国”国书（谈判代表证书），否则不进行谈判。后来在苏联驻迪化领事斡旋下，伊方放弃交换“国书”要求，⁴以“暴动区域人民代表”身份与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最后形成《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这说明，伊方和国民政府最终在“暴动”这一提法上取得谅解。

总之，“伊犁暴动”，既不是“匪乱”，也不是任何积极意义上的“革命”；较合适的中性提法是：民族主义的“暴动”引发中国边疆危机的“事变”。

二、中国大陆“革命史”研究的困境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关于伊犁暴动的早期报导，用的是“新疆少数民族自治运动”这一提法⁵。1949年初，毛泽东与秘密来访的苏联领导人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И. Микоян）谈话中说道：“隶属于乌鲁木齐政府的新疆伊犁州发生独立运动”⁶。其实，1950年以前，中共方面对这个“共和国”也没有统一的和适当的称呼，或者说还知道应怎样称呼它。1949年秋中共派驻伊犁联络员邓力群的实地报告则称之为“伊犁自治区”或“伊犁当局”，但用得较多的是“伊塔阿三区”。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致函“三区政府”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信函抬头称之为“新疆伊宁人民特区政府”代表。11月11日（这场“革命”五周年），毛泽东致电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赛福鼎·艾则孜（Səypidin Əzizi），称之为“伊犁革命”。至于中共何时正式称呼为“三区革命”，仍有待查证，但应是1950年以后的事了。⁷

毛泽东关于“伊犁”“独立运动”的说法，只是近年在苏联解密档案中被披露。此前，世人所知的是1949年那几份信函、电文。毛泽东的信函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⁸；其后，毛泽东为阿合买提江等五人因空难逝世发唁电和题碑文称：阿合买提江五同志“永垂不朽”。⁹就是有了这些函件电文，就足以给这场暴动以非常革命的光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学人就很难作文章。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组织编纂并于1980年代出版的

¹ 弗·哈利迪著，张帆译，《革命与世界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页30。

² 同上。

³ 杜荣坤等，《新疆三区革命史鉴》，页60。

⁴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页120。

⁵ 齐清顺：“新疆‘三区革命’称呼考察”，页86。

⁶ 沈志华编译，《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页295。

⁷ 齐清顺，“新疆‘三区革命’称呼考察——兼谈对有关问题的断想”，《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页89。

⁸ “毛泽东主席发来的邀请信和碑文、唁电”（代前言），载《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页1。

⁹ “毛泽东主席发来的邀请信和碑文、唁电”，页2-3。

《新疆简史》认为这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新疆各族人民中的先进分子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胜利配合下，在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经济、精神、物质等方面支持下，爆发的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¹。现在看来，这样的提法多少有点滑稽。

事实上，“革命史”研究者不得面对这样的难题，即曾为分裂的“东突厥斯坦革命”如何“汇入中国革命的洪流”？² 厉声在他的书中论证了“三区革命”的“二次革命论”³，并撰写了专题论文“三区革命运动中的‘二次革命’及其背景”，认为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总统艾力汗·吐烈（Ali Khan Türe）的退出历史舞台为标志，“三区革命”经历了“二次革命”，致使三区革命运动从“分裂毒瘤”的桎梏下解脱出来。⁴ 其实，按照赛福鼎的说法，这个“二次革命”提法最初由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dukirim Abbasof）使用。⁵ 问题是，既然有“二次革命”，那么建立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那次“暴动”，难道可谓第一次革命吗？1998年出版的《新疆三区革命史》的主要撰写人之一、新疆师范大学教授杜瀚2009年再论新疆“三区革命”史，认为苏联组织、策动、支持、控制新疆“三区革命”，并促成三区和国民党中央和谈，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在革命过程中发生过分裂祖国、反汉排汉的严重错误，但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⁶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资助出版的《新疆三区革命史鉴》一书，对此的解释如下：

〔临时政府宣言〕突出的一点便是声明脱离中国，建立所谓“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样露骨的分裂主义宣言，完全越出了阿巴索夫当初筹建“解放组织”时“建立自由、解放、民主的省份”的宗旨……临时政府内部斗争是明显的。一方要在11月7日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发动武装起义，另一方却要在11月12日（此为1933年喀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立日——原文夹注）在伊犁另外建立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斗争初期，伊犁的领导权无可避免地掌握在后者手中。于是我们看到，一场为反抗剥削压迫的正义斗争，怎样在艾力汗·吐烈等人的引导下，走上了一条令各族人民担忧的危险道路。⁷

但问题是，这场暴动反抗剥削压迫的“阶级斗争论”，确实有点牵强。笔者认为，此书所列举的“收缴枪支”、“献马运动”⁸，多半是引发暴动的导火索，所谓的“阶级斗争形势”大体上是拘泥于“革命史”撰写的要求而提出的。

中国大陆学界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即便现已有很大进步，但还未能突破毛泽东当年的定性。笔者于2004年底参加乌鲁木齐召开的“新疆稳定与发展高层论坛”，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在会上提出，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已为境内外民族分裂分子的一面旗子，应开展并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但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的回应是：此问题太敏感，还是放一放。至此，中国大陆学界有关这场“革命”的研究，还是有研究的禁区，比如，与当年分裂活动相伴随的民族仇杀活动，至今仍讳莫如深。

台湾学者吴启讷关于新疆现代史研究的评述，总的说来是一篇十分优秀的论文，他批评中国大陆学者“受到政治因素的形塑”，有的地方说得不无道理，但他批评“中共官方框架下的新疆

¹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着，《新疆简史》，第三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页353。

²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页171~174；《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新疆民族出版社，1994，页242~258。

³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页186。

⁴ 厉声，“三区革命运动中的‘二次革命’及其背景”，《石河子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页1-10。

⁵ 赛福鼎·艾则孜著，李继成译，《天山雄鹰：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页83。但须说明的是，赛福鼎的这部作品属于自传性历史小说。

⁶ 杜瀚、杜飞舟，“新疆三区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页34-44。

⁷ 杜荣坤等，《新疆三区革命史鉴》，页61。

⁸ 杜荣坤等，《新疆三区革命史鉴》，页41-42、45。

现代史研究”，结论竟是：“正是由于中共史学垄断了现代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历史的诠释权（例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反而迫使维吾尔人否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或将这种关系简化为单向的侵略与反侵略关系”。¹ 此论不大靠谱，首先上述两者（中共垄断民族历史的诠释权与维吾尔人否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并无因果关系；其次，否定与中国关系的“维吾尔人”，能代表多少维吾尔人？其三，完全不符合历史，笔者想提起注意的是以下史实。

第一，泛突厥主义者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Muhammad Amin Bughra，又译买买提·依明，汉名毛德明）²撰写的《东突厥斯坦史》，书中全篇是“东突”反对中国的“侵略”的斗争史，其核心思想是：

تۈرك سياستى تىنچلىقچە رۇمەر، ئىنسانىيەتچىل، توغرا كۆڭۈل ۋە ئالىجاناب ئىززەت نەپىسلىدىن ئىبارەت
(突厥的政治是和平、人道和高贵、尊严的政治)

چىن سياستى ئىستىلا چىلىق، ئىنسانىيەتسىز لىك ۋە ھىلىگەرلىك
(中国的政治是侵略、不人道和奸邪的政治)。³

书中号召：“每一个东突厥斯坦人民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抱定决心，抗战到底，视死如归，光荣牺牲”，“东突厥斯坦革命没有结束，不独立，革命就不会结束！”⁴ 这本书标志着“东突厥斯坦”思想的首次理论化、系统化。请注意这本书出版时间在 1940 年，那时有“中共官方框架下的新疆现代史研究”吗？

第二，1944 年伊敏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⁵展开“新疆突厥民族问题”大论战⁶，披着学术外衣，打着“三民主义”，鼓吹突厥“民族”的“自治”⁷（即离分裂、独立仅一步之遥的“高度自治”——笔者注），这难道也是“中共史学垄断了现代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历史的诠释权”，“迫使”所然？

第三，1945 年伊敏等在重庆出版《自由报》（*Erk*），报头名下竖起“东突”独立的核心誓词：“我们的种族突厥，我们的宗教伊斯兰，我们的祖国突厥斯坦”。⁸这与所谓的中共“官方框架”有什么关系？

第四，1950 年代流亡在土耳其的伊敏与去台湾的国民政府高官朱家骅有书信往来。朱家骅对这位多年的“友人”“有要新疆脱离中国而独立之意向”，“不胜惊异”。就其“所谓新疆问题”

¹ 吴启讷，“新疆现代史研究述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 年第 67 期，页 153、156。

² 伊敏（1901~1965）1942 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曾任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组织部专员，1948 年被任命为新疆省政府副主席。

³ شەرقىي تۈركىستان تارىخى: مۇھەممەد ئەمىن بۇغرا (كادۇل: 1940)، 124-26، 127-28. (伊敏：《东突厥斯坦史》〔喀布尔：1940〕)。是书在安卡拉、阿拉木图等地多次再版重印。

⁴ شەرقىي تۈركىستان تارىخى: مۇھەممەد ئەمىن بۇغرا، 470.

⁵ 黎东方（1907-1998），曾受业于国学大师梁启超，又求学于法国，学贯中西。1937 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北京、清华、中山、东北、复旦等大学。与傅斯年、李济等同为中国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⁶ 1944 年 10 月 13 日，伊敏等控制的“东突厥斯坦同乡会”（对外称“新疆同乡会”）在《大公报》上刊载《新疆同乡会对宪法草案之意见》，提出“请确定新疆民族为突厥族”，“请修正宪章之第四条内‘新疆’二字为‘突厥斯坦’”，“请在宪法中规定突厥族自治之条例”。次日（10 月 14 日），黎东方即在《中央日报》上著文批驳伊敏，而伊敏随即著文反驳。由此开始了新疆突厥民族问题大论战。论战文先发在《中央日报》上，后以《新疆突厥民族问题论战辑》收在伊敏、艾沙主办的《阿勒泰月刊》上。“新疆突厥民族问题”大论战一来一往四篇文章：黎东方：“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吗？”伊敏：“新疆省同胞是突厥族”，黎东方：“再论新疆同胞不应称为突厥民族 新疆不应称为突厥斯坦”，伊敏：“再论新疆同胞是突厥族”，参见《阿尔泰月刊》1944 年第 2 期，页 8-9、10-14、15-18、18-22。

⁷ 伊敏文中称说：“我国国民党昭示天下之内政政策，□（字不清——引者）揭国内民族一律平等。此次本会呈送对于宪法之意见，其动机无非要求三民主义最高之理想之实现。……所要求的仅仅就是建国大纲，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八中全会决议案中所允许的自治”，指责黎东方“至少不应践踏此一民族天赋之权利”。参见《阿尔泰月刊》，1944 年第 2 期。页 13。

⁸ 艾沙的《自述》，参见 İsa Yusuf Alptekin,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İsa Yusuf Alptekin'in Mücadele Hatıraları*, Derleyen M. Ali Taşçı. (İstanbul: 1985), 464.

三次覆函伊敏，一方面，从历史、民族、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义正辞严驳斥伊敏独立的四点理由；另一方面，是忆起“昔在重庆南京，时常与您晤谈，推诚相见”之情谊，苦口婆心地劝告¹。在这一时期，伊敏的疆独之念与中共的“官方框架”没有丁点关系。但朱家骅与伊敏的辩论从另一个角度体现，海峡两岸中华子孙在与“东突”的辩论中，终究是心心相印的。

总之，中国大陆学界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确实已取得相当进步，虽然还面临摆脱“革命史”研究困境问题，但所谓的中共垄断民族历史的诠释权，迫使维吾尔人否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之说，并不靠谱。

三、西方的视点：殖民地的独立运动

美国学者本森（Linda Benson）是研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代表人物，她的基本观点是，所谓“伊犁叛乱”是突厥穆斯林民族与外来的中国侵略者之间的冲突和土著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的观点²，代表着西方学者一般认识。在西方，汉人与中国人是划等号的，中国是汉人的民族国家，而非汉人就不是中国人，因此非汉人地区就是中国人的殖民地。比如，美国学者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等人就认真地使用“汉人”（Han Chinese）和“非汉”（No-Han），“汉移民的殖民统治”（Colonial settlement by Han Chinese immigrants）之类的概念。他们在为《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撰写的新疆历史部分，以1884年新疆建省为界，认为在此之前，新疆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之后，新疆是中国的殖民地。这无非说的是，中国在新疆主权是有问题的，表现出西方固有的偏见。³米华健坚持认为：“尽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实际上依附苏联，但它却是代表维吾尔、东干、满、蒙古及其他民族的“独立”国家（independent state）。”⁴另一位美国学者鲍文德（Gardner Bovingdon）认为，新疆“骚乱的根源是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组织的抱怨”，“由于汉族军阀和地方官员长达数十年草率、掠夺的统治，部分地导致了在维吾尔人中存在着深刻和普遍地反汉情绪”。⁵杜磊（Dru C. Gladney）强调：“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分离主义问题的根源，可直接上溯到它所执行的承认少数民族独立愿望的早期政策，这种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而且实际上鼓励当地人的民族化”。⁶英国学者泰勒（Christian Tyler）认为：“应看到，普通百姓以及真正的叛乱者不是被意识形态和政治教化，而是被怨恨驱使才起来反抗的”⁷。

总之，按西方视角，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只是个地理概念，不是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其中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比较早地提出所谓的“中国各蛮夷独立论”：“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应该从蛮夷民族——满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恢复其独立状态；同时，……中国与各蛮夷民族之间以及各蛮夷民族相互之间的联带关系应该断绝，而各自保持着独立的状态。”⁸此论首先受

¹ 参见王聿均、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页668-95。

²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³ James A. Millward and Nabijan Tursun, "Political History and Strategies of Control, 1884-1978", in S. Frederick Starr, ed.,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62, 48, 63.

⁴ James A. Millward and Nabijan Tursun, "Political History and Strategies of Control, 1884-1978", in S. Frederick Starr, ed.,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84.

⁵ Gardner Bovingdon, *Autonomy in Xinjiang: Han Nationalist Imperatives and Uyghur Discontent*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2004), 3, 19.

⁶ Dru C. Gladney, "The Chinese Program of Development and Control, 1978-2001", in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106.

⁷ Christian Tyler, *Wild West China*, 115.

⁸ 参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页158。

到日本学者的热烈欢迎，日本学者矢野仁一¹进一步提出“中国不但没有国境，而且可以说由于没有国境甚至连国家也不存在”。²一些西方学者不断发挥，制造了一大堆论调，如：非汉民族非中国人说；中国的北部边界不过长城说；满洲、蒙古、西藏、新疆非中国领土说；中国侵略准噶尔、“东突厥斯坦”说；中国“次等帝国主义扩张边疆”说，等等³。在他们看来，中国在新疆的殖民统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民族压迫和中国历届政府的政策，是引发自治和分离主义的主要动力。

总之，西方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殖民地独立运动的认识，并不可取，这里我想引证台湾学者对本森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比较有价值的批评是：“他们在讨论包括新疆问题在内与中国有关的民族问题时，或不假思索、或深思熟虑地将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中华思想’，质言之，即汉人的民族歧视思想。这样的结论，非常接近对近现代西方帝国主义在亚、非殖民地形成的民族关系结构所作的观察与批判。在此，研究者直接套用了‘殖民帝国侵略/殖民地人民反抗，争取民族自决’的批评模式，……多少显得有些粗率”。⁴

四、苏联的说教：民族自决权

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时，民族自决权成为苏联关于“东突”问题的基本说教。自1963至1982年的二十年间，苏联设在阿拉木图和塔什干的电台，每天以四至六个小时交替使用维吾尔、哈萨克语，集中对新疆展开宣传攻势。广播文章、讲话、谈话等各类文章共约2万余篇，3,000万字之巨，内容涉及到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民族、宗教、教育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着重宣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伟绩，说“维吾尔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新疆“要像苏联那样建立民族共和国”，应该给维吾尔人民“民族自决权”。⁵

“民族自决权”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文章有五六十篇之多。系统考查、研究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不同时期的不同提法和解释，大致可以认定，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种种论述有鲜明的针对性，即针对沙俄那样的殖民主义；十月革命后，特别是苏联成立后情况变了，提法也变了。简言之，列宁的“自决”基本点是非殖民化。如列宁提出来，斯大林强调的“民族问题中的自决权这个要点已不再是整个民主运动中的一部分，它已成为整个民主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⁶。

然而，苏共教条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实践，没有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与西方的“一国一族”论、民族分立主义划清界线，这正是苏联最终解体的原因之一⁷。在当今，民族自决走到底，就是民族分裂，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杨恕指出：“国际社会的共识是，自决权用于反对民族压迫和殖民主义，不能用来分裂国家。同时，一个民族的分离权不是单方面的权利，它应该是双方通过协商来实现的”。⁸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A. Nazarbayev）1992年在第四十七届联合国大会发言道：“在民族自决权的掩盖下，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完整性都

¹ 矢野仁一（1872~1970）日本近代外交史学家。在日本侵华期间，连续发表《满蒙藏非支那本土论》、《历史上满洲的支那主权无根据论》、《日本在满蒙的正当地位》等文章。

² 参见《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一卷，页161。

³ 参见潘志平等：《‘东突’的历史与现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页171。

⁴ 吴启讷，“新疆现代史研究述评”，页169。

⁵ 潘志平等，《‘东突’的历史与现状》，页140。有关1963至1982年间苏联塔什干、阿拉木图广播电台的反华报道的记录简报现存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⁶ 列宁，“关于自决权讨论的总结”，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民族解放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页21；斯大林，“再论民族问题”，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页185。

⁷ 潘志平等主编，《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民族和当代民族分立主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页164。

⁸ 杨恕，“前言”，载《世界分裂主义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页2。

会值得怀疑，使之分化的分立主义将会没有止境。”¹ 新疆学者艾则孜·玉素甫（Əzəz Yusuf）1990年提出“在新疆鼓吹‘民族自决’的实质是搞民族分裂”²。艾则孜是“三区革命”出身的高级干部，笔者与之交往中不止一次地听到他谈到，当初因在三区工作曾深受到苏联“民族自决”思想影响，而由民族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笔者认为艾则孜撰写的这篇文章是“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好文章”，“就理论意义来说，‘民族自决’思想大体属于西方人权观念的一部分，和自由、平等、博爱一样，在历史上起过某种进步作用，可是今天在人民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在已经独立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这却成了西方分化肢解这些国家的手段”³。

总之，笔者认为，在当今，以民族分离，领土分裂为内容的民族自决走到底，就是民族分裂。那些打着人权、民族自决旗帜的当代民族分裂运动，前途黯淡。

五、“东突厥斯坦”思想：“双泛”、“扎吉德”运动

“东突厥斯坦”运动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即“双泛”），这已是多年来许多学者一再论证的命题。米华健、王柯和笔者则将“双泛”的传入主要归之于19世纪末悄然兴起的以“扎吉德”（jadid）教育为主要形式的“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⁴。“扎吉德”，源于阿拉伯语，意为“新的”，即与传统的清真寺教育相对立的新式教育，发源于俄国鞑靼斯坦，而后，随着“双泛”重心的转移，在土耳其有较大发展。清末，扎吉德教育由俄国、土耳其传入新疆，在逐渐取代旧式的清真寺教育的过程中，促使了以近代教育为主旨的近代维吾尔文化的启蒙。对于这一文化启蒙运动，应予充分肯定，但也不得不看到其负面的作用，“双泛”由此传入新疆。事实上，民族主义的滋生和发展，正是基于这种近代教育发展。笔者认为，民族主义不同于古代的农民起义、群氓暴动，乃是近代政治运动。质言之，在一个古代文盲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主义运动。历史证明，随着现代知识的广泛传播，告别了古代农耕社会，在现代地缘政治的大背景下，作为“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的知识精英，在为构建或想象“民族”（nation）而竭尽全力，最终让民众深信我们是一个民族（nation）。至少在1908年以前，新疆维吾尔社会还无人知晓“东突厥斯坦”这个概念⁵，而1933年，在喀什就建立了第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王柯关于“扎吉德”教育的论述非常重要，他将19世纪末新疆兴起的“扎吉德”教育定义为“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并指出：“1933年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发生的时候，具有留学土耳其经历的阿图什的新式学校的教师动员学生支持运动。从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有着具有留学土耳其经历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与现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以及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的主要成员，后来大都成为了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这也可以说明两个运动之间的思想联系”。⁶但总的看来，对它的发展脉络的梳理还略显粗略。笔者在这里补充如下几点：

第一，这一运动首先萌发于俄国的鞑靼穆斯林社会，随后在行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得到丰厚

¹ 引自埃廷格尔（Я. Я. Этингер）著，钟华译，“独联体的族际冲突与国际经验”，《民族译丛》1994年第6期，页25。

² 艾则孜·玉素甫，“在新疆鼓吹‘民族自决’的实质是搞民族分裂”，《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页7-13。

³ 潘志平主编，《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页180-81。

⁴ James A. Millward, *Violent Separatism in Xinjiang*, 9; 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页29-32；潘志平等，《‘东突’的历史与现状》，页68-70。

⁵ 1908年，当时维吾尔最大的历史学家毛拉·木萨（Malla Musa, 1836~1915）著名的史著《伊米德史》，称新疆为“蒙兀儿斯坦”，一字未提“东突厥斯坦”。参见潘志平等：《‘东突’的历史与现状》，页86-87。

⁶ 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页32。

的土壤，或者说，在那里找到了知音和追随者。

第二，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俄国人伽普林斯基（Измайл Гаспринский），1883年他向“突厥人”明确提出“三统一”行动战略，即：“Единство в словах, мыслях и делах!”（在语言、思想和行动上联合起来！）¹也正是这一时期，伊斯兰世界开始受到外来殖民文化的强烈冲击。泛伊斯兰主义作为对西方政治、军事、文化入侵的反应，也呼之欲出。

第三，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在价值观有着根本区别，前者是民族主义的，后者是宗教主义的。这两个似乎不大相容的主义在“扎吉德”运动中交集。从这一点上看，“扎吉德”运动，既是民族复兴的运动，又是宗教改革运动。我们在研究“扎吉德”运动时，还很难将它完全归于这两个主义中的哪一个，因此，我们针对这一事实，将这两个主义称之为“双泛”。

第四，在二十世纪初，“双泛”通过“扎吉德”运动植入新疆，其表现为大量的“扎吉德”学校在天山南北开办，伽普林斯基创办的宣传“双泛”思想和理念的《译文报》（俄文版：Переводчикъ；鞑靼文版：ترجمان）在新疆民族知识界中广泛流传。

第五，新疆“扎吉德”教育开创了“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培养了第一批现代维吾尔知识精英，在新疆教育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同时也培养出第一批“东突”骨干分子，如麦斯武德（Masud Sabri）²等。

第六，苏联在其国内大反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出于自身政权安全的考虑，同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不可能不特别关心与之相邻的新疆地区政局。当看到新疆地区“双泛”的影响力的情况下，并不妨碍它利用这两个主义作工具，插手新疆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点非常重要。

总之，以往的研究都将“东突厥斯坦”运动缘起于近代欧亚广泛传播的“双泛”运动，这已成定论，且很正确。但如果深究俄国鞑靼斯坦兴起的“扎吉德”运动与近代维吾尔启蒙运动的直接联系，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东突厥斯坦”运动如何在新疆的滋生的。³

六、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结合点

19世纪中叶，尽管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已初见端倪，但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为，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认识，曾坚定地认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⁴。十月革命后，时代变了，列宁宣称：“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口号是正确的，⁵并强调“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⁶。1944年的苏联，即便不是公开的，但也是通过非常积极参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建立，以践行这一“联盟政策”。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 Barnett）认为：“尽管伊犁政权受到俄罗斯影响，但它首先遵循的仍是民族主义政策，而不是意识形态政策。必须指出，伊犁政权制度并没有在它控

¹ İsmail Bey Gaspıralı – (20 Mart 1851- 24 Eylül 1914) /ismailgaspırali.org/ 2014-10-24

² 麦斯武德（1888~1950），伊宁人。1904年赴土耳其留学，在那里接受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1915年归国在伊宁办扎吉德学校，曾被杨增新政府查禁。1935年赴南京投靠国民政府，1945年随国民党势力重返新疆，任新疆监察使，1947年出任新疆省主席，1949年被解职。1950年病故于家中。

³ 潘志平，“俄国鞑靼斯坦‘扎吉德’运动与近代维吾尔启蒙运动”，《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页23~34。

⁴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页9。

⁵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讲”，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412。

⁶ 列宁，“民族和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载《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页126。

制的地区推选苏维埃化……这是因为，在宗教方面，该政权并不拥护马克思主义，政权的领导人是宗教权威艾力汗·吐烈和哈基姆别克·霍加”。¹

王柯则认为，1944年在伊犁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合点”，也可以说是苏联支持的中国突厥伊斯兰居民的“圣战”，但同时认为，“包括这些留苏生在内，运动的领导层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由他们建立的组织，其性质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反政府活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组织”，而“要想全力对抗中国的统治以达到民族运动的目的”，唯有“接受苏联的领导，甚至积极地寻求苏联支援”，也就是说，“在摧毁中国政府对新疆的统治这一政治目标上，突厥系伊斯兰民族的民族主义可以与自我标榜共产主义国家的苏联找到共同的语言”²。

笔者认为，以上这些观点大体可以成立，但有些话说得有点绝对，比如说，“包括这些留苏生在内，运动的领导层**都不是**共产主义者”。那么，阿巴索夫呢？按一般说法，阿巴索夫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1930年代在迪化省立一中和新疆学院附中学习期间，受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接受马列主义理论。1942年，在伊犁专署任教育局督学时成立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和学习小组成员一起郑重宣誓：“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无论在任何困难境地，甚至于牺牲宝贵的生命，坚决不向敌人投降。”1944年4月在伊宁积极参与组建秘密进步组织——解放社。1946年12月，作为新疆的代表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开会期间，秘密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向董必武表达了对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朱德的敬意，追述了林基路³对自己的教诲，汇报了新疆的斗争形势，转交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致中共中央信，提出了希望中共派人来新疆领导各项工作。他先后任“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委员兼内务厅长、宣传部长、民族军政治部主任⁴。

因此，比较客观持平的看法是，这场运动虽然是苏联鼓动起来的，但它的领导层基本上还不是共产主义者。

七、分裂思想“病灶”：国民意识的迷失

“东突”的分裂思想的源流问题，也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之一。王柯将东突厥斯坦独立思想的“病灶”追溯到清朝统治时代，认为清王朝统治下的维吾尔社会，“既不是‘中华’又不完全是‘穆罕默德的乌玛’的存在”，“这些让维吾尔族民众实际上身处伊斯兰教的乌玛与中华之间的夹缝之中的制度和政策，同时也坚决地阻止了维吾尔族民众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的意识”。1884年新疆建省寓意于将新疆本土民族集团变“满洲皇帝之民”为中国国家之民，即“新疆内地化和维吾尔族民众的中国国民化进程”，“不能不说已是为时过晚”，质言之，“此前百余年中由他们培植起来的维吾尔族只属于清王朝、而与汉族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意识，已经变成孵化独立思想的病灶，深深地埋植在维吾尔族社会的肌体里”。⁵这是分析新疆分裂思想“病灶”的独特视角，颇有意义。

在笔者看来，现代“国民化进程”，是随着近代民族主义兴起，而现代国家“国民国家”

¹ A. Doak Barnett,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3), 65.

² 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页220-21。

³ 林基路(1916~1943)广东台山人。1933年在上海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2月,林基路受中共派遣到新疆工作,先后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专区教育局长、库车县县长、乌什县县长等职。1942年9月,被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被害。

⁴ 蔡锦松,“纪念维吾尔族爱国主义者: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页76-80;熊坤静,《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哈吉娅·阿巴斯,“一心一意跟党走——追忆父亲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烈士的闪亮人生”(2014年8月28日),天山网,http://news.ts.cn/content/2014-08/28/content_10467223.htm。

⁵ 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页20-22。

(nation-state,又常译作“民族国家”)取代古代的“王朝国家”(或“皇朝国家”)的过程。这里的“nation”,只是近代方出现的政治概念。作为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之“民族”是“nation”。“nation”并非我们习惯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东西,或者说,它就根本不是那种古代社会的种族、氏族、部落、部族、族群,或语言范畴的“语族”。其实,它是近代政治运作的产物,其基本特征是“国家”与“民族”的互为表里,比如“联合国”(United Nations)是“nation”的联合,这里的“nation”是“国家”,或者说是“国民国家”。按照19世纪方形成的“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y),承认“nation”,就意味着承认它有独立建国的权力。如民族主义研究大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言:“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ethnic)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¹因此,所有的民族分裂运动首要诉求,就是千方百计地争取其“nation”的地位,有了这一地位,就有了分裂、独立、建国的合法性。

“东突厥斯坦”运动本质上是近代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尽管至1920年代新疆还没有“东突厥斯坦”概念,但民族主义者开始从积极国外引入,并通过想象构建自己的突厥“nation”,而将中国以为是与自己完全无关的“汉人”(خىتاي, khitai²)国家。中华国民国家和国民意识的迷失,1930和1940年代连续出现两个“东突国”,就不是偶然的。

八、结论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在与苏联毗邻的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没有苏联在精神、物资、武器装备上,甚至军事人员的援助、支持,几支零星的游击队能不能打下伊犁,还是个问题。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大体上是处于幕后,践行与民族解放运动结盟之政策,但似乎未有在其所支持的“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愿。那个时代的苏联对于新疆不外有三种考虑:其一是不希望新疆出现反苏的地方政权,这涉及苏联国家安全,无可厚非;其二是在新疆谋求建立一个亲苏政权,当年那么费力气地援助、力挺盛世才,甚至不择手段,说到底还是苏联与盛世才的相互利用;当盛世才翻脸之后,就有第三种考虑,那就是利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的复杂局面,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名,搞一种具有伊斯兰色彩的“革命”。但这种做法有悖于国际关系准则,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并尽力避免被指认“赤色”输出而引起国际帝国主义的激烈反应。

既然是以伊斯兰色彩的“革命”操作,这个“共和国”最初的首脑选定了宗教上层代表艾力汗·吐烈,就是很自然的,宗教上层在这个“共和国”初创时期分享了部分权力。三区最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1949年给中共中央汇报“新疆特区”情况说:“我们的民族运动的基本动力是农民,但他们完全处在封建势力与宗教势力的统治下面。……为了团结最广大的阶层,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的青年在革命初期不能不把那些不忠实的革命者推在运动的前面,而使自己居于后面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因而也产生了革命初期封建势力在政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宗教教士成为政权的首领,……因此初期的民族运动在形式上带有宗教的性质和色彩”。³

无论如何,苏联操作的这场“革命”,归根结底是民族主义的。阿巴索夫讲话引用阿合买提江的话就明明白白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我们是很严重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只是在我们民族没有获得平等的情况下,我们是民族主义者”。⁴笔者的最终结论是:这场暴动尽管与社会主义苏联及本地的宗教势力发生复杂的互动、交集,但本质上属于分裂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范畴。

¹ 盖尔纳(Ernest Gellner)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页164。

² “Khitai”,维吾尔语,与俄语中的“китай”一样,源于“契丹”,既有“中国”之意,又有“汉人”之意。

³ “向党中央汇报新疆特区情况”(1949年8月21日),载《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页19。

⁴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民族主义者的理想启蒙者”(1948年9月11日),载《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页120。

【论 文】

俄国鞑靼斯坦“扎吉德运动”与近代维吾尔启蒙运动

——新疆“东突厥斯坦”运动的缘起¹

潘志平²

【摘要】19世纪末，欧亚腹地政治文化现象是“双泛”（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泛突厥主义发源于俄国鞑靼斯坦，其切入点是语言教育，即以“新式”的教育——“扎吉德”运动。“扎吉德”运动，既是民族复兴的运动，又是宗教改革运动。我们在研究“扎吉德”运动时还很难将它完全归于“双泛”中的哪一个。民族（nation）是由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构建、想象的产物，但构建、想象的必要前提是教育的普及。事实上，在古代文盲社会，是没有民族主义的。清末，新疆维吾尔族社会悄然兴起了一场近代文化启蒙运动，其源头来自俄国鞑靼斯坦的“扎吉德”教育。新疆近代文化启蒙运动开辟了新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教育，它的贡献应予充分肯定。但是，其负面作用是：“双泛”借“扎吉德”教育大举传入新疆，在造就第一代现代意义的民族知识精英的同时，也培植出麦斯武德等第一批“东突”骨干。这伙人在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而奔走呼号，形成了一个分裂主义的帮派，这就是新疆“东突厥斯坦”运动的由来。

【关键词】鞑靼斯坦 扎吉德运动 维吾尔启蒙运动 东突厥斯坦运动

民族主义运动是近代的政治运动。“东突厥斯坦”运动不是古代农民起义，更不是群氓暴动，而是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一部分，以往的研究都将它的缘起，归结于近代亚欧地区广泛传播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双泛”），这种认识是很正确的，并已成定论。我在三年前的一篇关于“东突”产生和发展的国际背景研究论文³，论及俄国鞑靼斯坦的“扎吉德”运动作为“双泛”的纽带，通过近代维吾尔民间启蒙教育传入新疆。本文将深入追究俄国鞑靼斯坦的“扎吉德运动”与近代维吾尔启蒙运动的直接联系，进一步探讨它是如何植入新疆地区，并直接地推动了“东突厥斯坦”运动。

一、“扎吉德运动”：“双泛”的交集和纽带

19世纪，全球政治生活上有两个突出的政治现象：一是英、俄、法、德等列强的殖民主义扩张活动到了收官境界，至这个世纪末，全球已被它们瓜分殆尽；二是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运动，其中，既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又有殖民主义鼓动的或刺激出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即“泛-主义”运动。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欧洲的“泛-主义”运动时行一时，如：泛日耳曼主义（Pan-Germanism）、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Pan-Scandinavianism）等，而对亚欧影响更深远的是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和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

泛突厥主义植根于亚欧相当大地区的突厥语化，首先萌发于俄国统治下的鞑靼斯坦穆斯林社会，随后在行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得到丰厚的土壤。本文所谓俄国的鞑靼斯坦，指的是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居住之地。这里曾有过的鞑靼诸汗国是建立在金帐汗国的废墟之上，其中，克里米

¹ 本文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² 作者为新疆大学文科基地、中亚研究院、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教授。

³ 潘志平等，“‘东突’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国际因素”，《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

亚汗国（Крымское ханство）夹在俄罗斯与奥斯曼两大帝国之间，曾一度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国。1783年，克里米亚汗国成为被俄罗斯兼并的最后一个汗国。

鞑靼人操突厥语并早已皈依伊斯兰教。在帝俄统治下的鞑靼人深受压迫，特别是克里米亚，随着鞑靼人成批流走土耳其而几乎去鞑靼化。鞑靼人本善经商，又在俄国诸突厥语民族中最接近俄罗斯中心地带，至19世纪，手握数百万卢布的鞑靼商人集团出现，在与俄罗斯资本竞争的过程中，新兴的鞑靼工商阶层民族主义兴起，表现为以宗教教育改革为面目的“扎吉德主义”（jadidizm/джадидизм）与守旧的“卡迪木主义”（kadimizm/ кадимизм）的对峙。“扎吉德”（jadid/джадид），源于阿拉伯语 جديد，与 قديم 相对，意为“新的”，即新式教育，从语音方式、学习制度、教学方法、课程内容和设置、教材选取和编写等方面对传统伊斯兰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¹“扎吉德”因此成为鞑靼社会宗教和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

欧洲的泛-民族主义通常是以民族语言为标志而行动的，无论是泛日耳曼主义，还是泛斯拉夫主义，都是如此，可谓是语言民族主义。受其影响，鞑靼斯坦的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地首先诉斥于语言，那就是“突厥语”。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伽普林斯基（Измайл Бей Гаспринский，1851-1914）。他是俄国泛突厥主义运动的思想鼓动家。伽普林斯基主张社会重建的关键在于教育，而教育的核心是通用统一的突厥语言构建。他从创办新式教育法的“扎吉德”学校开始自己的事业，他甚至宣称，学校驱逐世俗科学，直接违背伊斯兰教的基本规定。1883年他明确提出“突厥人”的“三统一”行动战略，即：

«Единство в словах, мыслях и делах!»(在语言，思想和行动上联合起来！)

如学者指出：

泛突厥主义的概念属于它自己所有，但许多策略甚至某些术语却都是抄自泛斯拉夫主义的，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领导发起和传播泛突厥主义会是鞑靼人，即受俄国统治年代最长，受天主教化、俄罗斯化压力最大的那个集团。其中特别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距奥斯曼帝国中的突厥居民较近，因而受到后者影响机会较多，而且他们四周都是异族，作为一个实体存在下去唯一指望就是与其他突厥集团取得联系。²

伽普林斯基还精心设计一套察合台式（Файдалы эглендже）通用突厥文，实际上是阿拉伯字书写的鞑靼文，并以此于1883年创办《译文报》（俄文版：Переводчикъ；鞑靼文版：ترجمان）。《译文报》成为伽普林斯基宣传泛突厥主义和与卡迪木主义斗争的武器。扎吉德教育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喀山、奥伦堡等地，如：《نازاد خخلق》（解放人民）、《ناڭ يۇلتۇزى》（晨星）、《ئىل نىسلاھ》（民众革新）、《ھايات》（生命）、《ناڭ》（觉悟）、《خۇمىر》（消息）、《بىزلىش》（安慰）、《قۇياش》（太阳）、《ترمۇش》（生活）、《ئورال》（乌拉尔）、《چاقماق》（闪电）、《ئەينەك》（镜子）、《يۇلتۇز》（星星）、《تاۋۇش》（语音）、《ۋاقىت》（时间）、《چوڭوش》（沉淀）、《يېڭى ئەسىر》（新世纪）、《چىگىنكە》（蝗虫）、《شورا》（舒拉）、《يولقا》（锤子）、《قارچوغا》（鹰）等等。其中《译文报》影响最大，其发行量由从最初的320份至鼎盛时期的万份以上，不仅广泛发源于俄属鞑靼斯坦、突厥斯坦、阿



¹ 张来仪，《试论近代俄国穆斯林的扎吉德运动》，《世界历史》2012，(2)。

² Jacob M. Landau.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3

塞拜疆，甚至还流传至土耳其、伊朗、埃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俄国鞑鞑人还将这份报纸携带至中国新疆，泛突厥主义就是通过这些鞑鞑人和这份报纸传播到新疆。



伽普林斯基的泛突厥主义主张号召俄国国内“突厥人”联合起来，声称非暴力，在与卡迪木斗争中或多或少带有反抗帝俄专制统治，帝俄当局对这支民族主义运动，相当警惕，并不时采取遏制、压制手段。伽普林斯基的弟子们不得不流亡俄境外，主要的去向是土耳其，推动了那里的泛突厥主义运动，泛突厥主义的重心开始转向土耳其。比较一下俄国鞑鞑斯坦与土耳其的泛突

厥主义，可以发现，它们缘起都有东方面对西方的冲击-反应的色彩。不同的是，前者多以教育为主题的宗教改革为主要话题，相对温和，甚至有点文化韵味；后者多以如何挽救濒临死亡的帝国为主题，其政治斗争气氛愈演愈烈。从这一点看，它们还并非一出笼就反动得不得了。但归结底（如我们原先的一本小册子概括得那样¹），它是操突厥语诸民族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逐步觉醒的民族意识的扭曲反映，它不能成大气候缘于找不到一个现实民族的现代化运动作为其历史载体，其理论、观念、思维都是来自狭隘的西方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走下去不回头，很容易滑向反人类的极端的种族主义的烂泥坑。

泛伊斯兰主义，是另一重要的政治运动。它是股宗教政治思潮，又是19世纪以来亚欧地区盛行连绵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泛伊斯兰主义内容包罗万象，因鼓吹者的诉说而异，在“穆斯林大团结”口号下，它与近代几乎所有的伊斯兰政治思潮和运动，诸如泛阿拉伯主义、泛突厥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亚及其毗邻的中亚一带是这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区，近代以来，这一地区的政局动荡不已，其中总是能听到、感受到泛伊斯兰主义的呼喊和行动。

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在价值观有着根本区别，前者是民族主义的，后者是宗教主义的。在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中是没有民族概念的，至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它那里只有穆斯林和异教徒之分，穆斯林不问种族、语言都是一家人。民族主义发轫于近代西方，它重体质、血缘、文化传统，但更重语言，宗教则在文化传统上有重要的位置。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泛伊斯兰主义受哈米德二世推崇过一度有些影响，它作为伊斯兰教改革派受到保守的宗教势力的强烈排斥，另一方面，又受到民族主义的嘲讽。如研究者指出，哲马鲁丁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并不是一种传统的宗教感情，而是与现代反殖民、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相似之处，可称为宗教性的原型民族主义。1870年，泛伊斯兰主义的开创者哲马鲁丁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堂演讲中把西文中的nation对译成阿拉伯语中的milla (millet)，他号召伊斯兰民族 (Islamic nation or milla) 团结起来，millet的前置定语仍然是穆斯林或伊斯兰，表示，他的这个主义不只是在倡导传统意义上的穆斯林团结，而是要在传统的millet上仿效民族主义运动，将全体穆斯林建构为一个统一的“伊斯兰民族”。² 这似乎是用民族主义改造宗教，或者是以宗教的外衣推行独特的民族主义。

俄国鞑鞑斯坦泛突厥主义发展轨迹却是另一种景象。伽普林斯基的泛突厥主义除了要与沙俄当局斗智，还要与保守的宗教势力争夺地盘。它行事相对温和，着力点在教育，从“扎吉德”运动入手。事实上，在“扎吉德”的旗帜下，鞑鞑斯坦的泛突厥“精英”，一直没有与泛伊斯兰主义认真交恶，只是偶然对它有所攻讦，但从来没想到与之决裂。大多数情况下，它披着伊斯兰的外衣小心谨慎地掩盖泛突厥主义的真面目。1914年第32期的泛突厥主义报纸《伊犁》(Иль)发

¹ 陈延琪 潘志平等，《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² 咎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北京：三联书店，2011.128。

表的社论说：“伏尔加流域的鞑靼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吉尔吉斯人、高加索人和突厥斯坦人以及逊尼、什叶派都是统一的穆斯林，是手足同胞，具有共同的需要，尽管生活各异，也曾彼此为敌、相互残杀，但仍然是同胞兄弟，希望能够互相理解、和睦相处”。¹可以说，鞑靼斯坦的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在“扎吉德运动”交集，或者说，这两个看似不大相容的主义在“扎吉德”运动中，获得联系的纽带。从这一点上看，“扎吉德”运动，既是民族复兴的运动，又是宗教改革运动。所以我们在研究“扎吉德”运动时还很难将它完全归于这两个主义中的哪一个，因此，我们针对这一事实，将致力鞑靼斯坦“扎吉德”运动的两个主义称之为“双泛”。

十月革命后，中亚地区的反苏维埃活动主要是“巴斯马奇运动”（Басмачество，1918～1923）。其社会基础是中亚的反动封建巴依，“扎吉德主义”是其意识形态。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是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两面旗帜。青年土耳其党三雄之一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亲自指挥土耳其军队窜入中亚亲临指挥巴斯马奇匪帮反苏维埃的叛乱，自称“突厥斯坦艾米尔”，甚至狂妄地向苏维埃政府发出通牒：“布哈拉、突厥斯坦、希瓦人民自由独立的决心不可动摇”。²恩维尔帕夏1921年毙命于战场。当时正处在苏维埃政权与巴斯马奇匪帮决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严肃指出：

非俄罗斯民族受过民族压迫，它们的这种地位对当地居民中的共产党员也不无影响，这些共产党员有时不善于把本民族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同所谓‘全民的’利益区别开来。我指的是有时在非俄罗斯共产党员中间可以看到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东方就表现在大伊斯兰主义、大突厥主义。³

斯大林此番警告代表了俄共（布）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严正立场。当巴斯马奇已基本崩溃，中亚大体平静下来之时，俄共（布）高层发生了“苏丹-加里也夫”案。⁴1923年斯大林在俄共12次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苏丹-加里也夫事件”演讲说，苏丹-加里也夫如果仅仅是有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体系，那还是“一种半不幸”，“仍可加以容忍”，问题是，苏丹-加里也夫有秘密联系巴斯马奇匪帮的罪行，斯大林演讲中甚至提出“苏丹-加里也夫主义”

（Султангалиевизм）这样的概念，表明他不是针对一个人，而是应对有共同政治思想的一群人。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苏丹-加里也夫主义还能发生，它在东方各共和国，特别是在巴什基尔和鞑靼两地得到了自己的若干同道者，这就无可怀疑地说明，在这些共和国内占优势多数的右派分子，不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有力堡垒”。⁵结果是，随着苏丹-加里也夫被处决，苏联东方的各共和国，首先是巴什基尔和鞑靼共和国大量少数民族党员被清党并在肉体上被消灭。⁶1940年，又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内的“不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一大批民族被集体流放。结果是将泛突厥主义的原产地整个端掉，苏联的泛突厥主义受此沉重打击，至苏联解体，也未形成有组织的活动。⁷此后，

¹ A. M. Аршаруни, X. Габидуллин. *Очерки панисламизма и пантюрк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1931.p.82.

² Jacob M. Landau.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p.112.

³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46.

⁴ 苏丹-加里也夫（1892～1940?），Мирсайд Хайдаргалиевич Султан-Галиев，鞑靼人，出生俄罗斯鞑靼地区的乌法省，毕业于喀山的一所师范学校，当过教员，出版过鞑靼期刊，积极参加《Ислах》革命组织。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到巴库。1917年5月，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穆斯林大会，并当选为全俄穆斯林委员会委员。7月，在圣彼得堡参与建立穆斯林社会委员会，任执委会书记。1917年以来，领导着穆斯林民族人民委员会。1918年5月，他参加了鞑靼-巴什基尔苏维埃共和国的制宪。国内战争时期，任俄联邦穆斯林军事委员会中央委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主席（1919年）。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东方局主席（1920～1923）。俄罗斯穆斯林共产党（Российская мусульманск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的创始人和领导者。1923年被捕并开除党籍，后被处决，1990年平反。

⁵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第249，251。

⁶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乌兹】Г.А.希多亚托夫著（钟华译），“‘米尔赛义德-苏丹-加里耶夫事件’——苏共民族政策的根本转变”，《世界民族》1998年第1期。

⁷ 须指出的是，苏联在其国内大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出于自身政权安全的考虑，同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不可能不特别关心的与之相邻的新疆地区政局。当看到新疆地区的“双泛”的影响力的情况下，并

土耳其成了“双泛”活动的大本营，而且具有深厚的反苏反共色彩。

二、新疆“扎吉德”教育：近代维吾尔启蒙运动

民族(nation)是由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构建、想象的产物，但构建、想象的必要前提是教育的普及。事实上，在古代文盲社会，是没有民族主义的。清末，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传入，是与新疆近代民族教育之开端相联系的，其中“扎吉德”教育的植入是关键。

新疆社会的传统教育体制

清朝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十分落后，几乎没有什么教育事业。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传统教育大体是清真寺经文教育。历史资料记有：

俗亦重识字，以识字诵经为出众。皆童时肄习之，传教者曰阿浑（即阿訇），师傅之谓也。其人不受官职，诵经讲礼，立品端方，不饮酒、不吸烟，恪守遗规，期为表率。常劝人行善事，学好样。讲舍必傍树荫，室中无椅桌，师徒席地而坐，旁设矮桌一二张。夏日则环坐树根，捧书诵读，凡入学者，各执木简，或牛羊版骨一片，趋谒阿浑，阿浑为之书字于上，即读本也。小儿不率教者，则以红柳木条笞其脚心……每至七日，供送普儿一文，遇节饷面馍油馓而已。¹

1884年新疆建省前，军府不理民事，更不过问教育，维吾尔族教育则完全为伊斯兰宗教教育。而内地迁来的汉、回民，或为农夫、或小本经商者，其子弟多不读书，即便想读书也没有学校和教师。建省后，行政建置与内地划一，官办教育开始起步，各地设立义塾，逐渐形成官办和民族宗教开办的双重教育体制。官办义塾不仅在汉、回民族聚居区兴办，而且在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区开办，教授维吾尔族儿童学习汉文。当时规定，凡入学维吾尔族学生每年赴各府州县考试一次，及格者给予童生和监生顶戴，成年后准予充当头目，不论是否出任头目，经过道一级复试合格者，准予更换五品以下顶戴。其目的是培养一批懂汉语的地方基层的民族官员。但总的来看，汉文义塾教育和民族传统的清真寺教育，覆盖面都极有限，接受基本识字的人在全社会人口中是微不足道的，这种状况直到步入20世纪大清帝国覆亡的最后时刻。

中国进入20世纪面临的最大的灾难是：首都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被迫接受诸帝国主义国家强加和《辛丑和约》。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不得不实行“新政”，其中，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是实施教育“新政”的基本内容。1901年9月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12月5日，清政府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很快出现了办新式学校之热潮。新式学校仿西方的教学制度，在中小学堂除保留传统的经史课目外，增加诸如算术、地理、历史、物理、化学、动植物学、外文、图画，体操等全新课目，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意义之教育的诞生。

随着内地新式教育轰轰烈烈地进行，新疆的教育也随之发生变化：自1905年起，迪化（乌鲁木齐）原有的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并在课程设置上增添了俄、英、德、法等外国语。在伊犁，先后设立了绥定初等小学、宁远高等初等两级公校、汉回学校、满营义校、女子琼玉学校和商务学校。新疆各府厅州道县办学之风渐盛²。

汉文教育大体跟随内地新式教育发展亦步亦趋，而维吾尔的新式教育也开始起步，但走的是另一条路。当年官办义塾完全是旧式教育，为师者只授诗文不教实学，学童只能死记硬背课文而

不妨碍它利用这两个主义作工具，插手新疆事务、干涉中国内政。1940年代，新疆伊犁所建立起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就是它一手扶植并在政治和军事支持下搞出来的。

¹ 吴嵩震选辑，《历代西域诗抄》，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286。

² 王栓乾主编，《走向21世纪的新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167。

不识文字，更不知其义。起初也有维吾尔权贵带领子弟恳求人塾者，但多半图个按月领取钱粮，行之数年后，竟有雇佣贫民子弟替代入塾现象。在整个中国新式教育兴起大潮中，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新式教育，不能照搬汉文的新式教育，而源于俄国鞑靼斯坦的“扎吉德”教育，已由中亚传入，正成为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新式教育因地制宜地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新疆的新式教育，还是民汉并行的两种教育体制。

新疆民汉并行的教育体制，基于汉与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上存在着较大距离这一客观现实。它们的各自发展，固然为各自民族教育事业做出各自的贡献，但政府听之任之毫无作为，其负面效果是民汉文化上的隔离在继续，并不断深化，不利于统一国家的文化整合。事实上，作为民族主义的“东突厥斯坦”运动，正是在这种文化隔离中获得滋生的土壤。

近代维吾尔“启蒙运动”

伽普林斯基倡导的“扎吉德”教育，在俄国所有的穆斯林地区产生了广泛巨大的影响，新方式学校在克里米亚、北高加索、伏尔加-乌拉尔和中亚等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资料显示：到1905年，较大的学校都接受了此种教学方法，1912年喀山地区的1088所穆斯林学校中采用新方式者多达90%。鞑靼人中每100人建就有1所学校，而在俄罗斯人中1500-3000人建有1所学校。¹为宣传“扎吉德主义”，伽普林斯基1883年创办了《译文报》，很快流传于中亚在内的俄国穆斯林地区。日本研究伊斯兰问题和当年苏联民族问题最著名的学者山内昌之曾经指出：“在19~20世纪初期的鞑靼社会中，学校教育的改革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通过这一改革，喀山在“1905年革命后成为俄国穆斯林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伊斯兰世界中扮演着并不亚于伊斯坦布尔、开罗、贝鲁特的角色”。²

据王柯教授研究：“东突厥斯坦”运动之起源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有直接的联系，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视角。他指出：

1880年代，也就是清王朝实行“新疆建省”的前后，随着平定阿古柏伯克政权之后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俄国获得俄国商人在新疆地区完全免税和允许“以货相易”、“以各种货物抵账”等特权之后，维吾尔族社会与俄国（实际上是鞑靼商人）之间的贸易迅速扩大，出现了因从事工商业、尤其是商业而致富的巴依（bay，富人），也就是工商业资本家阶层。与此同时，随着维吾尔族社会与外部、尤其是外国之间交流逐渐扩大，维吾尔族社会悄然兴起了一场近代文化启蒙运动。³

启蒙运动（Siècle des Lumières），通常是指在18世纪初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间的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与理性主义等一起构成一个较长的文化运动时期。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它是继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的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启蒙者，“启发”群众的“蒙昧”以破除封建迷信，首先以新式教育学改革中世纪的旧学校。发源于西方的启蒙运动着力点在反封建反教会，而它波及到处于不大相同社会环境的东方，则赋予民族觉醒和民族复兴的民族主义内容。如前文所述的，源于俄国鞑靼斯坦的“扎吉德”运动。⁴

王柯教授认为：“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最早开始于天山南部维吾尔族社会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喀什噶尔地区。1883年，在位于喀什城市北面约20余公里处的阿图什县的依克沙克地方，

¹ Равил Фәхретдинов, *Татар Тарихы*, 转引自热合木吐拉·艾山. “近代俄国鞑靼人在新疆的教育活动及其影响”,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² 王柯,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3, 页30.

³ 王柯,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页29.

⁴ 如前文所述, 泛突厥主义是以俄国鞑靼斯坦的“扎吉德”运动开端的, 起初确有对抗帝俄殖民统治之意, 至于它后来的发展则是另外的事。

著名的工商业资本家胡赛因·穆萨巴约夫(Husayin Musabayow)和巴乌东·穆萨巴约夫(Bawudun Musabayow)兄弟倡议开办了维吾尔族社会第一座新式学校。¹

我的学生热合木吐拉·艾山教授的最新调查研究有新发现²:

一, 时任塔城伊玛目、哈孜职务的喀山鞑靼人库尔班外里·哈里迪(Kurban wali Kalidi, 1846-1913)是第一位将伽普林斯基的《译文报》传入新疆塔城的。

二, 库尔班外里·哈里德在他的著作《东方全史》(تواریخ خهسه شیرفی اسمنده)里提供确切的信息是: 他本人于1316年Sha‘ban月15日(此伊斯兰历, 即公历1899年12月29日), 在塔城创办了扎吉德学校³。他为1902年6月21日出版的一期《译文报》撰写的报导中说: “维吾尔族学生在短时间内学会识字, 并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当然离不开伽斯普林斯基创造并快速推广的‘扎吉德’教学法”。

王柯之说仅据老人回忆, 况且这所学校是不是地道的“扎吉德”学校, 似有问题。因为据俄文资料, 伽普林斯基1884年才在克里米亚首府巴赫奇撒莱(Бахчисарай)创办第一所“扎吉德”学校⁴。热合木吐拉·艾山之说, 有当事人的文献资料为证, 毋庸置疑。此外, 从地缘上看, 塔城距“扎吉德”运动发源地近得多, 因此, 新疆第一所的“扎吉德”学校更可能是1899年在塔城建。无论如何, 伽普林斯基所创办的《译文报》和“扎吉德”教育, 在十几年间就传入新疆, 还是令人惊讶的。

“扎吉德”运动波及新疆维吾尔社会, 有特殊的地缘文化因素。新疆维吾尔人与喀山鞑靼人, 在语言(同属突厥语族)、宗教(伊斯兰教)和习俗上有密切联系, 它们都是既农耕又擅经商, 两地人员的往来十分频繁。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维吾尔族人民的杰出代表包尔汉先生, 祖籍新疆阿克苏, 出生地在鞑靼斯坦的喀山。研究资料显示: 由于1881年中俄圣彼得堡条约的签订, 只有俄国商人可以在新疆活动, 新、俄贸易长足发展。这时住在新疆的俄国臣民有一万多人, 其中45%在北疆, 其余在南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从喀山一带来的鞑靼商人和知识分子, 他们主要活动在塔城和伊宁地区。但是在生意和教育方面主要分布在地区是伊宁。⁵

各种鞑靼语报刊的大量流入, 扩大了扎吉德教育在新疆的影响。1905年俄国革命后, 鞑靼扎吉德教育运动得到新的发展机会, 与此对应, 直到1918年底鞑靼人共创办63种报纸, 34种杂志。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那时鞑靼扎吉德派通过《译文报》直接指导喀什噶尔的扎吉德教育运动。在《译文报》的第123-124期上刊登了题为《巴赫奇萨莱致喀什噶尔的信》, 信中写道: “你们要在喀什噶尔各地努力普及新方式施教的初级学校教育、建立印刷厂创办报刊、掌握汉语、选派学生赴俄国和土耳其留学、设立伊斯兰慈善机构以服务与管理学校工作、办学要争取富商的支持、在喀什噶尔创办一所讲授各种自然学科的高级学校、办学方面多派人学习伊宁的经验、选举民族代表去北京参加国会”等9项指教。⁷

如果说, 19世纪末, 新疆的“扎吉德”教育已开始起步, 那么, 清廷1905年推行“新政”后, 新疆的“扎吉德”教育进入了大发展阶段。一批维吾尔资本家的办学热情高涨, 大力资助本地学生出国留学, 上阿图什的玉山穆萨巴耶设立《慈善协会》, 并宣称: “创办学校和图书馆, 资

¹ 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29~30.

² 热合木吐拉·艾山,《近代俄国鞑靼人在新疆的教育活动及其影响》.

³ 托瓦里赫·赫塞·希里菲·阿塞明德: 菲里巴特利·阿达瓦利. [M] 喀山, 1910(库尔班外力·哈力德:东方全史).第751页.

⁴ Джадиды и подъем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движений в Туркестане и конце XIX начале XX в.

www.histogood.ru/hgoods-342-1.html

⁵ 热合木吐拉·艾山,《近代俄国鞑靼人在新疆的教育活动及其影响》.

⁶ Nadir DEVLET, 1917 Ekim devrimi ve Türk-Tatar millet mejlisi, Ötüken Neşriyat, İstnbul, 1998, s56-57.

⁷ 热合木吐拉·艾山,《近代俄国鞑靼人在新疆的教育活动及其影响》.

助出国留学的人”。¹ 穆萨巴约夫兄弟就送 7 个维吾尔族青年到与自己有贸易关系的俄国喀山地区去留学。这些人回国之后，又回到依克沙克学校，扩大了学校的教育规模，并根据当时喀山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学校的课程设置课程，制订了学校的教学内容。据说到了 1892 年，由穆萨巴约夫兄弟派遣到俄国和土耳其去留学的人员已达到 50 名以上。穆萨巴约夫家族负担了留学的全部费用。到麦加朝觐的知名阿訇阿不都卡迪尔·大毛拉（Abdukadir Damulla），经土耳其和埃及回到喀什噶尔后，于 1912 年在喀什城里办起了当地第一座新式学校。在此前后，伊犁、吐鲁番、奇台、哈密、库车、阿克苏等地的维吾尔社会都陆续建起了新式学校。²新疆“扎吉德”学校的教材大部分从俄国喀山引进鞑靼人编写出版的教材。如热合木吐拉·艾山 2010 年调研中收集的课本有：《逻辑学》、《植物学》、《卫生学》、《教育学》、《道德学》、《教学大纲》、《阿拉伯字母表》、《算术》、《动物学》、《土耳其语读物》等课本³。

三、“双泛”输入和第一批“东突”骨干

“扎吉德”教育启动了新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教育，1910 年代末，先在伊犁和塔城，然后在喀什噶尔等维吾尔族聚居区出现了一批以“扎吉德”教育为名的世俗学校。学校里开设语文、算术、史地、文体诸课，大力加强文化知识的教育，使得宗教色彩浓厚的经文教育体制相形见绌，促使经文学校自身进行改革，历来由伊斯兰教机构主持拥有的教育领域发生了变化，从而新疆旧式宗教教育逐渐过渡到了新式世俗教育。⁴ 它的贡献应以充分肯定。但是，其负面作用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由此传入新疆。

新疆“扎吉德”教育，直接使用来自俄国鞑靼斯坦的浸透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内容的教材。为了办学需要，各学校想尽办法聘请来自俄国鞑靼斯坦和土耳其的外籍教师。巴乌东·穆萨巴约夫先后从土耳其聘请了阿巴拜克里（Ababakil）、艾哈迈提·卡玛尔（Ahmet Kamal）、阿布都拉赫曼（Abudu Rahim）、穆凯莱（Mukal）等人来校任教。阿巴拜克里于 1905 年回国后，艾哈迈提·卡玛尔成为中心人物。应巴乌东·穆萨巴约夫的请求，艾哈迈提·卡玛尔于 1907 年在依克沙克办起了维吾尔族社会第一座师范学校。⁵

据热合木吐拉·艾山调查：喀什噶尔的阿布都卡迪尔大毛拉于 1912 年开办一所新式学校，聘请外籍教师的同时，每年派 10-15 名学生赴伊斯坦布尔、乌法、奥伦堡等地留学。吐鲁番阿斯塔那人马赫穆德·穆依登聘请喀山鞑靼人的艾达艾拉尼，于 1915 年在自己的家乡出资开办了第一所扎吉德学校，校名为“马赫穆迪亚学校”。1917 年十月革命后，马赫穆德·穆依登再度赴俄国经商时，邀请木合普拉·穆合普里及古兰旦木·阿碧斯泰夫妇、艾力伊布拉音、伊萨木丁、夏米谢日甫、法赫米等 6 位鞑靼知识分子来吐鲁番任教。和田商人库尔班阿吉·卡伊马克于 1913 年聘请在喀什噶尔从教的土耳其籍教师伊斯马依尔·艾克在和田市“阿勒屯鲁克麻扎迈德力斯”开办一所扎吉德学校。这个学校存在到 1915 年。北疆各地新创办的扎吉德学校都聘有鞑靼人，1912 年在迪化的诺盖清真寺旁边办有一所扎吉德学校，聘请名叫孜纳吐拉的喀山鞑靼人任教。1915 年，租用该校旁边的三间房间又办有一所女校，聘请名叫玛丽亚姆的鞑靼女士任教。1920 年代，两校被扩建成为初级水平的中学校。在伊宁几个俄国籍鞑靼人和当地穆斯林开办几所新式学校和阅览室，创办突厥语的报刊，扎吉德教育快速发展。塔城的富商乌迈尔阿吉于 1910 年把儿子阿布都热合曼等几个青年派往喀山就读。他们回国后，在塔城“克孜尔清真寺”旁出资开办

¹ 热合木吐拉·艾山，《近代俄国鞑靼人在新疆的教育活动及其影响》。

² 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30。

³ 热合木吐拉·艾山，《近代俄国鞑靼人在新疆的教育活动及其影响》。

⁴ 热合木吐拉·艾山，“清末维吾尔族教育改革运动”，《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2(3)。

⁵ 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31。

有三个班的“乌迈日亚学校”¹。

在俄国的“扎吉德”学校就在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1912年一份帝俄政府警方送呈内务大臣的报告了伊什包比学校校长包宾斯基的问题：

不论包宾斯基兄弟或者上述教师都在进行反俄和反政府的宣传。通过进行宗教谈话，散发君士坦丁堡出版的小册子和报章，在民和学生中散布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该学校学生竟明目张胆地在大街上公开高唱充满违法内容的鞑靼和土耳其歌曲。在歌曲中亵渎神圣的俄国皇帝，颂扬土耳其苏丹。该校悬挂的皇帝肖像被挖去了眼睛和嘴。当一部分守法民众对此逆行妄为多次抗议时，却遭到包宾斯基等人和学生的强辩反驳，甚至声言同抗议民众断绝关系并以动武相威胁。²

新疆的“扎吉德”学校灌输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更是有恃无恐，如日本学者大石真一郎所指出：应穆萨巴约夫家族的邀请来到喀什噶尔地区办起师范学校的艾哈迈提·卡玛尔在学校中，教育学生们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才是他们的领袖，教学生们演唱土耳其的进行曲，其教育内容具有强烈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倾向。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世界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育唤醒当地的维吾尔族居民的“突厥人”意识，让他们感到对于“突厥人同胞”的责任，支持“伊斯兰世界盟主”的奥斯曼帝国。³包尔汉也指出：在土耳其留过学的伊犁的麦斯伍德·赛布里，也在新式学校里教育学生说：“我们的祖先是土耳其人”⁴。

就这样，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借“扎吉德”教育的普遍推进，大举传入新疆，在造就第一代现代意义的民族知识精英的同时，也培植出第一批“东突”骨干。其中有出国游历或与外籍人接触交往过程中，直接接受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有在俄国、土耳其留学后返回后积极在各地办“扎吉德”教育，大量的的是在新疆接受“扎吉德”教育过程中接受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

麦斯武德（Mas'ud Sabri, 1888~1950），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人物。麦氏是阿图什富商玉山巴依的孙子，玉山巴依因生意上的缘故，曾遍游欧洲，先后游历过巴黎、柏林、莫斯科、伊斯坦布尔等地，因为受宗教的影响，他对伊斯坦布尔有浓厚的感情。这种影响后来一直主导着麦斯武德的人生。1904年赴土耳其求学于土耳其哈美的耶学校和伊斯兰堡医学院，在那里接受了泛突厥思想。1915年回国，带了几个土耳其人在伊犁开医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麦斯武德对俄国奉行的共产主义理论及其革命极其厌恶。原来，他在土耳其留学时就一直憎恶与奥斯曼土耳其为敌的俄国，他尤其不能容忍中亚地区苏维埃政权根据共产主义原则实行的“农业革命”。为了抵制这种新思潮对新疆的影响，麦斯武德又出资创办了“土兰”、“德尔乃克”、“东迈亥莱”等“扎吉德”学校，有两千多名学生，全部用土耳其文授课，大肆传播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

杨增新认为麦斯武德所办学校对地方社会稳定危害甚大，从而对其一一查禁，并曾将其下狱关押10个月。1933年新疆大乱，麦斯武德曾投入地方军阀麻木提师长，充任其政治顾问。1935年，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以控诉盛世才亲俄亲共获南京国民政府重用，1936年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历任参谋本部边务研究所教授边务组专门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委员。⁵在南京、重庆，与先后投奔国民政府的穆罕默德·伊敏

¹ 热合木吐拉·艾山，《近代俄国鞑靼人在新疆的教育活动及其影响》。

² A. M. Аршаруни, X. Габидуллин. *Очерки панисламизма и пантюрк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1931.p.27.

³ 转引自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31。

⁴ 包尔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兴亡”，《文史资料选集》（第79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110页。

⁵ 新疆名人介绍，《阿勒泰杂志》，重庆：1944[1:1]

(Muhammad Amin Bughra, 1901~1965)、艾沙·阿勒甫金(İsa Yusuf Alptekin, 1901~1995) 结伙, 打出“中国突厥斯坦”旗号, 鼓吹“突厥民族”“高度自治”, 从事“东突”分裂活动。¹1945年随着国民党势力重返新疆, 麦斯武德先就任新疆监察使, 后一度出任新疆省主席, 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阿勒甫金分别出任省府副主席、秘书长。正是这伙人在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而奔走呼号, 形成了麦斯武德—伊敏—艾沙为首的帮派, 这就是新疆“东突”势力的由来。新中国建立后, 麦斯武德1950年病故于乌鲁木齐家中, 而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阿勒甫金则辗转流亡于土耳其, 在那里建立了境外第一个“东突”活动的基地, 后来的“世维会”头目艾尔肯·阿勒甫金(艾沙·阿勒甫金之子)、热比娅等则是他们的徒子徒孙。

【论 文】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史研究综述²

潘志平

1944年夏秋, 新疆政局剧变。统治12年的“新疆王”盛世才被解职还未离去之际, 8月17日, 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在伊犁巩哈县(今尼勒克县)乌拉斯台打响了武装暴动的第一枪。10月7日, 新任新疆省主席吴忠信就任第4天, 巩哈县县城被攻破。11月7日, 由苏联入境的六十多人的武装与巩哈游击队在伊宁发起暴动, 经六天激战, 攻占了伊宁市国民政府所有军警据点。11月12日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这在台湾一般称为“伊宁事变”。至1945年夏, 这个“共和国”完全控制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地区。1946年6月6日, 伊犁、塔城、阿山暴动区人民代表与国民政府签订《和平条款》, 并宣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已完成自己的使命, 三个地区已分别直接归属于省政府”³, 虽然名义上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但这三地区仍处在武装割据之下, 一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

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是自1930年代以来不断涌动的“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运动是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口号、纲领和行动的民族分裂运动。问题是, 1944年的这个“共和国”复杂得多: 一是, 它一直与社会主义苏联有扯不清的关系; 二是, 毛泽东1949年8月18日致电这个政府代表称: “你们多年来的奋斗, 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⁴。1950年以后, 大陆的各种官方文献中称之为“三区革命”, 而不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因此, 很长时间里, 至少在大陆学界, 不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而只有“三区革命”。曾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纪大椿在1980年撰文说,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一历史事件“长期以来是一个语焉不详、讳莫如深的敏感问题, 甚至是不敢涉足的学术禁区”⁵, 自纪大椿做上述表示之后, 迄今又已过去三十多年, 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¹ 关于这一问题, 将另文《东突厥斯坦运动与国民政府》专述。

² 本文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2014年10月号。

³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页136。

⁴ 《新疆三区革命史》页229。

⁵ 纪大椿:〈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新疆近世史论文选粹》(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页112。

本文将就苏俄和中亚学者、西方学者、中国大陆学者、台湾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关于这个“共和国”研究状况进行综合评述，以探究有关这个“共和国”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不同国家、地区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研究特点，取得的成就和不足之处。

一、苏俄和中亚学者的研究

愈来愈多的史料证据都一再证明，苏联深深卷入这个“共和国”的事务，甚至可以说，没有苏联的政治的，特别是军事上的作用，这个“共和国”能否存在一天，都是个问题。因此，有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一直为苏俄学者高度重视。

1960年代以前，苏联学者早期研究更多强调这场运动是“民主运动”（*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并力图与毛泽东1949年8月18日电文相吻合。雅可夫列夫（А. Г. Яковлев）在“1944-1949年新疆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帝国主义进入新疆的目的就是反苏，“三区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运动。^[1]库特卢科夫（М. Кутлуков）的论文“1945-1947年南疆喀什地区人民民主运动”认为：南疆人民为了民主和自由与国民党政府开展斗争，并最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社会。^[2]他的另一篇论文“1944-1949年新疆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说：“这一运动初期是带有民族主义以及力图把新疆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色彩……，只是在后来的斗争中，起义的领导人逐渐开始明白与中国人民联合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立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苏联认为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敏古诺夫（Н. Н. Мингулов）的论文论题干脆就是“新疆人民民族解放运动是整个1944-1949年革命的组成部分”。^[4]以上苏联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立场，与当时苏中处于最美好的“蜜月”时代特征相适应。

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此后，苏联学者则强调这场运动是“原住民”（*корен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的“民族解放运动”（*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如哈克木巴耶夫（А. А. Хакимбаев）的论文“20世纪30-40年代新疆原住民族解放运动”，其标题就说得非常清楚。^[5]拉希莫夫（Т. Р. Рахимов）的论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中国新时期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地位”认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反对汉族统治者的民族运动”。^[6]而曾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高级军官的祖龙太耶夫（Зунун Таипов）^[7]，则著书《为自由而斗争》，公然提出，新疆要么应该像蒙古人民共和国一样得到独立国家地位，要么就应该成为苏维埃联盟的

^[1] А.Г.Яковле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народов Синьцзяна в 1944-1949 гг.*,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Китай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Т. XI. –(Москва: 1955),155-88.

^[2] М.Кутлуко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народов Южного Синьцзяна (Кашгарии) в период 1945-1947 гг.*, Научные работы и сообщения. Отдел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АН УзССР. Кн. 1. –(Ташкент:1960), 206-18.

^[3] М.Кутлук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1944-1949гг. В Синьцзяне как составная часть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итая.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 (Ташкент: 1963), 188-98.

^[4] Н.Н.Мингул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народов Синьцзяна, как составная часть обще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44-1949 гг.)*, 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им. Ч.Ч. Валиханова АН КазССР. Т. 15. – (Алма-Ата: 1962), 68-102.

^[5] А.А. Хакимбае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корен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иньцзяна в 30-х и 40-х годах XX века.*,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4 (120). –(Москва: 1971), 239-58.

^[6] Т.Р.Рахимов, *Место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народов Китая в новейшее время.*, Втор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в новейшее время.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АН СССР.(Москва: 1977), 68-70.

^[7] 祖龙太耶夫(Зунун Таипов), 苏联国籍, 原“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副总指挥, 1949年随民族军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曾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少将衔, 1962年返回原籍苏联。

一个独立国家。^[1]这一时间，苏联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研究，完全服务于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

在 1990 年代末，俄罗斯学者巴尔明（Валерий А. Бармин）出版了《苏中关系中的新疆（1941-1949）》，将 1940 年代的新疆放在苏中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北疆三区起义运动（*Восстание в Трёх северных округах*）”和“苏联对待‘三区革命’（*Революция трёх округов*）的立场”成为这本书关注的主题。他首次引证了俄罗斯解密的一些档案资料，最重要的发现是，“今天我们可以肯定的说，1944~1945 年北疆三区起义运动的成功在许多方面取决于苏联全方位的积极援助”。^[2]虽然还未将所有的细节问题都弄得清清楚楚，但无论如何是在利用苏联档案研究这一问题上开了一个好头。

历史研究经常要受到政治干扰，像“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样涉及到中苏关系中相当敏感的历史研究，尤其如此。苏俄学界有关这个“共和国”不同时期的研究倾向，也正生动地反映苏俄在不同时期与中国的政治关系。

中亚国家与新疆毗邻，这些国家学术界对“东突”问题也有一定的兴趣。哈萨克斯坦资深中国学学者瑟罗耶日金（К. Л. Сыроежкин）的《中国民族分离主义的幻梦与现实及中亚地区安全》是一部重要著作，他用“幻梦”（Мифы）来形容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旗帜的“东突厥斯坦”运动。^[3]中亚国家学者一般将“东突厥斯坦”运动定性为“土著维吾尔民族”问题及其自决权相关的“民族解放运动”。^[4]对此，瑟罗耶日金批评说：“这样做，学术上是经不起推敲的，而政治上则是有害的”。^[5]

二、西方学者的研究

1950 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不乏涉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拉提摩尔（Owen Lattimore）和贝洛夫（Max Beloff）的著作^[6]，在论述苏联远东政策与新疆问题时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新疆“东突厥斯坦”的历史。惠廷（Allen S. Whiting）与盛世才合著的《新疆：小卒还是轴心？》一书^[7]，更多地站在盛世才的立场叙述伊宁暴动的背景及其与苏联的关系。英国学者福布斯（Andrew D. W. Forbes）的《中国中亚军阀与穆斯林：1911-1949 年民国新疆政治史》^[8]一书，是一部新疆近代史概论，这部著作对民国时期新疆的政治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第六章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鲍温德（Gardner Bovingdon）、杜磊（Dru C. Gladney）等美国学者为《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一书撰写的相关篇章，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东突厥斯坦”问题^[9]。美国学者鲍大可（A. Doak Barnett）

^[1] Зунун Таипов, *В борьбе за свободу*.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4) .

^[2] Валерий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гг.*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БГПУ, 1999) 84.

^[3] К.Л.Сыроежкин,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этнического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в Китае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лматы: Дайк-Пресс, 2003).

^[4] Б. Бектурганова: “Уйгурский экстрем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Алматы: Компекс, 2002).

^[5] К.Л.Сыроежкин,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этнического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в Китае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518.

^[6] 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Boston: Little, Brown, 1950); Max Beloff, *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44-1951*,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7] Allen S. Whiting and Sheng Shih- ts'ai,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

^[8]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Lond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63~228.

^[9] 參見 S. Frederick Starr, ed.,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Armonk, NY; London: M. E. Sharpe, 2003) .

和泰勒（Christian Tyler）的著作也涉及到这一问题的研究。^[1]以上这些美国学者主要关注点在于新疆当前的现实问题，“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问题是他们分析研究现实问题的背景陈述，在相关敏感问题的描述还是比较谨慎，因为不是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也就没有特别重要的发现。

事实上，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有专门研究的西方学者是本森（Linda Benson），她在1990年出版的《伊犁叛乱：穆斯林对中国新疆政权的挑战？》^[2]一书是西方学界对这一问题最具权威性的论著，她的基本观点是：“伊犁叛乱”是突厥穆斯林民族与外来的中国侵略者之间的冲突。她强调中国新疆当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暴虐统治的同时，并不重视苏联对这一事件的影响和作用。按照她在另一篇文章〈1940年代的维吾尔政治人物：伊敏、艾沙和麦斯武德〉^[3]的说法，新疆地方民族的反抗运动受到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近代土耳其及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本森还为文集《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撰写了第七章“新疆少数民族的教育和社会流动”，说道：“1915年土耳其的一些宣扬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突厥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流入新疆，它们主要宣扬泛突厥思想和泛伊斯兰思想”，“长期以来，一些富裕家庭，尤其是在新疆以西的穆斯林世界有亲属的，往往将自己的孩子送往穆斯林国家上大学”，“1944年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几位领导人，包括有非凡能力的阿合买提江在内，都在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的大学留过学”。^[4]事实上，至1940年代“东突厥斯坦”运动领导人已明显地分化出亲苏与反苏两个政治派别，本森这里指出的是，这两派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

三、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

纪大椿1980年撰写的“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5]，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开创者。纪先生潜心研究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三区革命斗争的功与过，都有苏联人的份”^[6]。寥寥数语，份量可谓不轻。尽管当时有关的苏联档案还未解密，但其所做的研究并未过时，至今还不能忽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7]。此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朱培民教授发表了“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后又收录在他的个人文集中。他认为，1943至1949年期间，苏联对新疆政策发生过三次变化：支持和策划“三区革命”，协助国民政府政治解决新疆问题，支持中共促成新疆和平解放^[8]。新疆大学教授徐玉圻领衔主编的《新疆三区革命史》^[9]，为

[1] A. Doak Barnett,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3); Christian Tyler, *Wild West China: The Taming of Xinjiang*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

[2]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3]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4] Linda Benson, "Uygur Politicians of the 1940s: Mehmet Emin Bugra, Isa Yusuf Alptekin and Mesut Sabri", *Central Asian Survey* 10, no.4(1991), 87-113.

[5] Linda Benson,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mong Minority Populations in Xinjiang", in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192, 193, 194.

[6] 据纪大椿介绍，这篇论文初稿形成于1964年，1980年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总编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要求完成内部文稿。1980年代在一些学术论坛中做过专题报告，文稿首次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五辑（内部刊物，1990），页1-11。

[7] 纪大椿，“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五辑，页11。

[8] 原三区高级干部、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乌依古尔·沙伊然阅后对作者纪大椿表示，写得很好，就是那么一回事。

[9] 朱培民，“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增刊，页87-99。后收入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页135-157。

[10]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第一部系统研究“三区革命”的史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杜荣坤等人合著的《新疆三区革命史鉴》^[1]，虽然最近刚出版，但还是作者二十年前撰写的。这些研究成果代表大陆学界1990年代的研究水平，明显地突破过去竭力回避的一些问题，如苏联与三区革命间关系。也是这个时期，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一批学者关于“双泛”研究，成果丰硕。主要有：纪大椿的论文“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渗透——兼评分裂主义的旗号‘东突厥斯坦’”，系统论述了什么是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什么是“东突厥斯坦”，它们是怎样产生的，怎么传播到新疆来的。文中特别指出，1940年代“一方面是境外进来的用马列主义词句伪装起来宣扬‘东突厥斯坦’‘独立’的宣传品，一方面是当地赤裸裸的泛伊斯兰主义直接煽惑，造成群众的思想混乱，其危害是相当巨大的。”^[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冯大真主编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论文集》^[3]和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杨发仁主编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论文集》^[4]，收录了新疆和内地一些学者的重要论文，是国内学术理论界对东突厥斯坦思想的集中清理。

1990年代末以来，新疆本地学者继续工作外，上海、北京、兰州等地大学、科研机构的学者从历史的、国际政治的和民族学的角度，积极参与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无论从内容和质量上更上一层楼。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的“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5]，是研究“三区革命”与苏联问题极有份量的论文，这篇论文充分使用了苏联解密档案，非常有价值。沈志华将“三区革命”放在中苏结盟的大背景下展开讨论，认为苏联对新疆政策趋向，时而与地方当局结好，时而同少数民族联合；时而支持独立，时而强调自治；时而表示强硬，时而倾向缓和；时而支持国民党，时而援助共产党，但其目标始终是在中苏走向同盟关系的大前提下，从政治和经济上确保苏联在新疆的优越地位和特殊影响。沈志华多年致力于苏联解密档案的搜集、整理、翻译工作，对于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东突厥斯坦斯坦共和国”的研究，贡献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薛衔天的“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和“是推进新疆革命，还是维护自身安全？——关于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民族因素”认为，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亦即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迫使苏联采取了务实政策——促使三区与中国中央政府和解。^[6]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黄建华的《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描绘了国民党势力1943年进入新疆后，与三区军事对峙阶段的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统治新疆的政策。^[7]《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第四任主任厉声的重要著作，是一部新疆历史与现状的概述性著作，^[8]第五章专门论述了“三区革命运动与新疆和平解放”，其突破是除了使用了一些苏联解密档案外，还引证了俄罗斯学者巴尔明关于苏联与三区革命的研究成果。此外，还有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延琪、新疆师范大学教授杜瀚等人关于“三区革命”

^[1] 杜荣坤等，《新疆三区革命史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 纪大椿，“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渗透——兼评分裂主义的旗号‘东突厥斯坦’”，载《新疆近世史论文选粹》，页167。

^[3] 冯大真主编，《〈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4] 杨发仁主编，《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内部文集，1992。

^[5]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页213-42。

^[6] 薛衔天，“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1期，页68-74；“是推进新疆革命，还是维护自身安全？——关于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民族因素”，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页345-59。。

^[7] 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8] 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161~187。

的专题论文，分别探讨了三区政府机构设置、军事斗争、农业生产发展等问题，对我们具体了解这个“共和国”政权的内部结构和军事和实业发展等细节问题有所帮助^[1]。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主编的《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民族和当代民族分立主义》^[2]和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的《世界分裂主义论》^[3]，则是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相关的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理论著作。陈延琪、潘志平主编的《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4]、潘志平等著的《“东突”的历史与现状》^[5]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第三任主任马大正等著的《“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6]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普及读物。杨恕等人根据解密的苏联档案中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布)中央的一份关于新疆问题的报告，对苏联准备再度干涉新疆事务的企图做出分析，认为苏联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新疆一系列变故的幕后策划者和支持者，可以确定苏联从来就没有放弃对新疆的关注，只不过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苏联的新疆政策有时明显、有时隐蔽罢了。^[7]

毫无疑问的是，大陆学界有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已取得显著进步。我以为，在大陆束缚这一问题研究深入的主要障碍有：一，它与苏联的关系；二，毛泽东关于它“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的评价；三，如实地评价（至少在它的初期）与分裂相伴随的民族仇杀活动。上述第一条已突破，而二三条仍是不大好直面的问题。

四、台湾学者的研究

国民政府去台后相继出版了“外交部”、“国防部”和“蒙藏委员会”的有关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其中张大军自1950年代以来出版《新疆近四十年变乱纪略》、《新疆动乱四十年》、《新疆伊宁事变与伪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成立及其溃灭》和十二卷本《新疆风暴七十年》^[8]，既有作为历史当事者的回忆，又收录了当年大量新疆历史档案，这些对东突厥斯坦运动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台湾方面的研究不甚多，但做得很认真、规范，如许秀蓉的研究，仔细地梳理了张治中代表国民政府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谈判过程以及对新疆局势演变过程；再如吴启讷的研究，则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一涉及民族关系问题放在“中国革命”和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讨论，还是独到见解的。^[9]如吴启讷评论：台湾方面“仍大致倾向於将伊宁事变定位为苏联实现其吞并新疆野心的第一步。这种观点显然建立在1940年代后半期中华民国政府作为全中国主权的代表，以及国民党反共抗俄的意识形态这两个认知基础上。对待后来变节的张治中，台湾

^[1] 陈延琪，“论新疆三区政府农业生产的发展”，《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页19-25；“伊塔阿三区政府管理机构设置述略”，《西域研究》1997年第2期，页89-97。杜瀚，“论新疆三区革命中的军事斗争”，《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页35-41。“新疆三区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页34-44。

^[2] 潘志平主编，《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民族和当代民族分立主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3] 杨恕，《世界分裂主义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

^[4] 陈延琪、潘志平主编，《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5] 潘志平等，《“东突”的历史与现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6] 马大正、许建英，《“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7] 杨恕、曹伟，“从哈共（布）中央的报告看苏联对中国新疆政策的变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3期，页141-46。

^[8] 张大军，《新疆近四十年变乱纪略》，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四十年动乱新疆》，香港：亚洲出版社，1956；“新疆伊宁事变与伪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成立及其溃灭”，《新疆研究》，台北：文瑞印刷文具公司，1964，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丛书之二民国五十三年刊；《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

^[9] 许秀蓉，“张治中与战后新疆局势之演变（民国34年-38年）”，《国史馆馆刊》复刊期22（1997年6月）页155~174。吴启讷，《民族认同，国际竞争与中国革命》（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

研究者倾向于指责他在面对伊宁政权时，无原则地妥协退让，背叛，出卖党国利益”。^[1]的确，这些大体是站在国民党“党国利益”上的研究，可以理解，但新疆问题是中国的问题，毕竟不是“党国”的问题，我想台湾的同行会有新的认识的。

另外，在1950年代，国民政府高官朱家骅与流亡在土耳其的“东突”头目穆罕默德·伊敏（Muhammad Amin Bughra）有书信往来。朱家骅对这位多年的“友人”“有要新疆脱离中国而独立之意向”，“不胜惊异”，就其“所谓新疆问题”三次复函，从历史、民族、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驳斥穆罕默德·伊敏独立的四点理由，义正辞严。^[2]这生动地说明，“东突”之右翼穆罕默德·伊敏曾一度投靠国民政府，与“东突”之左翼，即以苏联为后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貌似对立，但分裂新疆的政治诉求是一致的，而中共与国民党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但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大事上却是心心相印。

五、海外华裔学者的研究

这主要包括王大刚和王柯的研究。他们都生长于新疆，有特殊的“新疆情结”，因此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拥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生长新疆的经历、背景，可就地搜集中国大陆，特别是新疆本土的相关第一手史料；二是身居海外，可广泛采集国外以及台湾地区的重要档案、史料。此外，其研究环境也相对宽松。

旅居澳洲学者王大刚的《在苏维埃的阴影下：伊宁事变——种族冲突和新疆国际竞争，1944-1949》^[3]是一部优秀著作。他的基本观点是：“伊宁事变”，绝非单纯的突厥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也非单纯的中国内部事务，而是许多国际、族际复杂因素交叉互动的结果。从这本书的副标题就可表明作者特别强调的是，苏联在1944年伊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王大刚认为，斯大林关于新疆政策的目标和结果，不可就事论事孤立地看待，须放在苏联亚洲政策中来考虑。当时，新疆汉族统治当局与地方民族长期的历史冲突正好为苏联扩大影响力并排斥英美日的影响，提供了绝佳时机，只不过国际政治现实不允许同时制造第二个“外蒙古”。在新疆制造“国中之国”反而更加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王大刚大量使用了第一手英文资料，如书目中提及的美国驻迪化和重庆外交官发给华盛顿的数百封电报，非常珍贵^[4]。有评论说：王大刚关于苏联操控“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之议，“就史料证据之坚强，可谓铁证如山”，同时也批评说：“低估了新疆突厥穆斯林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力量”。^[5]但无论如何，王大刚的这部厚重的专著问世，大体扭转了学术界关于当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苏联关系语焉不详的研究状况。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6]是旅日学者王柯的研究成果。总的看来，王柯与王大刚分别独立完成各自的研究，但基本观点不谋而合。王柯的四个考察视角或许是他的重要创新：一、新疆地区社会及突厥伊斯兰民族社会的社会结构；二、民族革命思想的起源与质变；三、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内部结合原理和共和国的权力构造；四、围绕着国际关系和国际

^[1] 吴启讷，“新疆现代史研究述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67期，页166。

^[2]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页668~695。

^[3] 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gjiang, 1944-1949*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476-85.

^[5] 吴启讷，“新疆现代史研究述评”，页171。

^[6] 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政治。^[1] 这本书是他 1995 年日文出版的博士论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研究——中国的伊斯兰和民族问题》^[2] 基础上的增补改写本。王柯近年来还发表了一些较高质量学术论文和著作^[3]。这些论文中的一些创建性的观点和认识融入了这部增补版的著作之中。问题是，王柯的增补本易名为“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但对 1930 年代喀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4]，只用了三页一笔而过，主要内容仍是 1940 年代伊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历史；其实，1940 年代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也并非仅“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总统”艾力汗·吐烈（Ali Khan Türe）等人的活动，须注意的还有投靠国民政府的麦斯武德·沙比尔（Mas'ud Sabri）、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尤素甫·阿尔普特金（Isa Yusuf Alptekin）“三位先生”^[5]，故此，易名反倒名实不符。此外，王柯之作对前人的成果吸收不足，如视而不见王大刚已公布的美国外交官发给华盛顿的数百封电报。难怪王大刚的“书评”就该书“甚至没有提及”自己的那本书，似有微词。^[6]

六、小结

伊宁暴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成立，迄今已七十年整。有关这个“共和国”的研究总是不得不要受到种种政治因素的限制和左右，或者说，这个“共和国”研究的本身就是政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政治因素淡化了，学术研究的空间得以扩张，许多问题能够得到科学的、更加符合实际的解释。比如，苏联方面当年是那么坚决地试图将自己与这个“共和国”的关系搞干净，而现在俄罗斯学者却能自由地利用解密档案寻求其中的真相。同样，关于这个“共和国”的研究，在中国大陆学界曾长期被视为“讳莫如深的敏感问题”。1980 年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对于这个“共和国”的研究有了相当的进步，特别是这个“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完全可以研究，但问题是，还需摆脱“阶级斗争观”的演绎，突破“革命史”研究的困境。台湾、海外华裔学者的研究，本来就没有太多的政治包袱，相信今后会有更多贡献。西方研究可能会呈现多元态势，

^[1] 王柯，“前言”，载《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頁 xv。

^[2] 王柯，《東トルキスタン共和国研究——中国のイスラムと民族問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5）。

^[3] 王柯著，冯谊光译，《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新疆建省’”，《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7 年 2 月号，页 40-53；“构筑‘中华民族国家’——西方国民国家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页 60-83；“‘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二十一世纪》2003 年 6 月号，页 73-83。

^[4] 1933 年，新疆大乱，4 月 12 日省城迪化爆发政变，结束了省主席金树仁的统治，握有军事实力的盛世才坐上了“新疆王”的宝座，但动乱仍在蔓延。甘肃马仲英部联合伊犁屯垦使张培元向省军发起围攻。正当盛马在北疆酣战中，穆罕默德·伊敏在和田称王，接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喀什成立，它自 1933 年 11 月 12 日成立，至 1934 年 2 月 6 日被马仲英部攻灭，前后虽 87 天，但这是“东突厥斯坦”分裂运动在新疆首次付诸行动。

^[5] 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Ehmetjan Qasim）在《同盟》杂志撰文谴责“三位先生和他们的集团”，其所谓的“三位先生”指的就是麦斯武德·沙比尔、艾沙·尤素甫·阿尔普特金、穆罕默德·伊敏三人。参见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页 87。这还有艾沙的“自述”为证，其中有他对麦斯武德说的一段话：“我们以‘三位先生’著称，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主义者都非常尊重您、伊敏先生和我”。参见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İsa Yusuf Alptekin'in Mücadele Hatıraları*（艾沙·尤素甫·阿尔普特金，《为了受奴役的东突厥斯坦》），Derleyen M. Ali Taşçı.（İstanbul：1985）481。

^[6] 王大刚，“书评——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3 年第 81 期，页 207。

实证的客观的研究，可能会愈来愈多，但另一方面，这样一个可以做成“分裂中国”的议题，也会引起某些学者的兴趣和兴奋。

同时还须看到，七十年前的这场“东突厥斯坦”运动，发生在与社会主义苏联一墙之隔的新疆伊犁地区，这是一个特别的地域——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多民族地区，一个特别的时代——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由此，这场民族主义暴动与社会主义苏联及本地的宗教势力发生复杂的互动、交集。正因为如此，不同立场、视角的研究者，在许多问题的认识上有较大差异，限于篇幅，有关这个“共和国”问题的争论、讨论将另文专述。今后有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趋势可能是：一，随着各国诸方的档案不断开放、解密，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得以不断拓展，历史的细节问题必然搞得愈来愈清晰；二，随着政治干扰因素愈来愈淡化，研究成果愈来愈接近历史的“真相”，且愈来愈具有可信度；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作为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社会主义交集的标本，可能引起相关理论家的愈来愈浓厚兴趣。希望在不久将来，各国、各地区的相关学者能面对面地出席研究这个“共和国”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交流和切磋各自的研究心得。

【书 讯】

《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种族、宗教和族源的角色》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米尔顿·M·戈登 (Milton M. Gordon) 著，马戎 译

译林出版社 2015 年 1 月

目录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亚社会与亚文化

第三章 同化的性质

第四章 同化的理论：第一部分，导言与盎格鲁一致性

第五章 同化的理论：第二部分，熔炉

第六章 同化的理论：第三部分，文化多元主义

第七章 美国的亚社会与亚文化

第八章 族际关系的评估与可能的走向

译后记

米尔顿·M·戈登 (Milton M. Gordon) 出生于 1918 年，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社会学教授，也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种族和族群问题的著名学者，他先后出版了 4 部著作：1964 年的《*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年的《*Human nature, class, and ethnic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年主编的《*America as a multicultural society*》(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和 1988 年的《*The Scope of Soci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在这 4 部著作当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在 1964 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种族、宗教和民族来源的

角色》(*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即分别获得两个奖项，一个是 Anisfield-Wolf Award in Race Relations，一个是 Brotherhood Award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s and Jews。四十多年来，这本书始终是美国研究种族和族群问题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并被奉为研究美国种族和族群问题的世纪经典，其原因就是这本书对理解和指导美国种族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方向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精辟的宏观梳理，首次提出理解和分析族群同化的变量体系，系统分析了美国社会的族群结构和各个族群亚社会的演变历史，讨论了美国社会和学术界探讨族群政策的各种代表性观点，并对美国社会种族和族群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政策建议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1984年我在美国学习时首次读到这本书，它是这一年我选修的“Ethnicity”（族群问题）研讨课的主要理论参考书之一。那时我主要关注的是戈登提出的关于分析和测度族群融合的七变量模型，这个模型及其主要变量也成为我博士论文借鉴的理论框架和1985年在内蒙古赤峰地区进行户访问卷调查的重要参考。在撰写学位论文期间，为了全面地了解国际学术界有关种族、族群、民族主义等问题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各国民族制度与政策设计背后的政治理念与分析逻辑，我系统地阅读了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社会学家们发表的相关著作和文章，这对我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和社会历史知识有极大帮助。

美国是一个以移民及其后裔为人口主体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兴工业国，至今每年吸收的移民规模仍在百万人左右，因此，它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就必然面临各种涉及到种族、祖籍国、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因素而且极为复杂和棘手的族群关系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黑人问题，种族问题不仅引发了美国历史上唯一的内战，在20世纪60年代还一度造成严峻的社会分裂和全国性的暴力冲突，但是通过“民权运动”和随后几十年在族群关系方面的逐步调整，美国整体的种族、族群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好转。2008年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高票当选为美国总统，这是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在种族观念上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同时，近年来我们也看到华裔、西班牙语裔人士在美国政坛和司法界开始崭露头角。纵观美国两百多年的族群关系史，跌宕起伏，令人感叹。在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的制度、政府的政策逐步转变和调整的整个过程中，应当说美国社会科学家们所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在阅读这些关于美国种族、族群关系现实状况、发展态势的调查报告、政策反思、理论探讨的学术著述时，我经常被这些学者们的严谨学风和实证精神所吸引，也被在相关论述中体现出来的人道关怀和理性思考所折服。

我认为在调查和研究当今中国社会的民族问题时，中国学者需要从四个来源吸收相关的知识体系和实践经验：（1）中国的民族关系发展史，在中国几千年民族交往历史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群体观和看待群体关系的传统思想与实践，相关历史文献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宝藏；（2）欧洲和美国的“民族观”及其演变，我们可从多部族帝国时代（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等）追溯到17世纪开始的“民族主义运动”（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以及美国等欧洲移民建立的国家中演变出来的“族群”观念和解决族群关系的实践；（3）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及其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国家、中国等）的实践，包括“民族”定义、民族识别与身份认定、对少数民族的各项扶助与优惠政策，以民族为单位的联邦制或区域自治制度等；（4）其他发展中国家民族-族群的历史演变，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阿拉伯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有殖民地经历的国家，独立后如何在原殖民地的行政区划内进行各自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理论讨论与实践。

在以上这4个知识体系中，目前中国研究民族的学者最熟悉的，主要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特别是斯大林的著述，但同时对于苏联时期及其解体后各国的民族关系实际发展情况很少关注。此外，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在资料发掘和理论提炼上尚有很大空间，采用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对民族关系现状与存在问题开展实证性调查研究，只是近些年来才在中国的许多地区逐步开展。近几年，欧洲有关“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些经典著作开始译成汉文出版，但是系统介绍美国族群社会学研

究的经典著作仍然没有被译成汉文。在苏联解体后，对于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对于国民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方面造成什么影响，以及这些影响与国家解体之间存在什么关联等问题，我国学者对此的理论反思也远远赶不上西方学者。所以，广泛阅读国外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尽可能地拓宽学术眼界，以解放思想的科学精神来吸收人类社会发展出来的所有知识，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调查和思考中国当前的各种民族关系问题，这是摆在我国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历史性任务。

我在1987年3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88年开始在社会学系开设“民族社会学”研究生课程，在选择教学阅读材料时，我深感国内学术界对西方国家的族群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得太少，所以我在1988年就选编了一本英文参考文献文集，复印了作为选课学生的阅读材料，其中就有戈登这本书第二章有关同化模式的变量体系这一部分。这本参考文献文集的汉文版在1997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以《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书名正式出版，修订版在2010年以《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为书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与此同时，我开始向一些出版社推荐书单，希望能够把一些西方最经典的有关族群社会学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著作翻译成汉文并介绍给国内的学生和研究者。当时我草拟了一个推荐翻译的8本书的书单，其中就包括了戈登的这本书。我从1988年开始先后联系过7家与我曾有出版合作关系的出版社，但是最后都是不了了之。我想，这有可能是出版社认为这类书不可能热销而缺乏积极性，也可能是联系版权转让的手续过于繁琐。总而言之，这件事一直拖了20多年，没有任何结果。

2011年我有一次和清华国学院的刘东教授一起吃饭，他是我国学术界很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也是多部影响重大的丛书翻译系列的主持人。他和陈来教授离开北大转入清华国学院，我始终认为这是北京大学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我在席间顺便提起想翻译国外族群研究经典著作的事，刘东兄当即要我把这个书单发给他，他表示愿意尝试着帮我联系出版社，这自然使我喜出望外，但是经过了20多年的挫折之后，我对此实在不敢抱有太大的希望。回顾此事，我当时还是大大地低估了刘东兄的影响和能量。也就是在几个月之后，他就告诉我，译林出版社愿意出版并已经开始与版权所有者联系相关版权转让事宜，并将纳入他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真是悲喜交加，喜的是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事宜终于尘埃落地，中国将会有更多的研究者、学生和关心民族问题的读者可以通过汉文版了解这些在西方早已普及多年的基础知识，悲的是这件事在我的生命历程中迟到了20多年，我这个年过六旬、即将退休的人，已经没有当年充沛的精力来面对这项工作了。

译林出版社确定了版权的目前有三本书，分别是戈登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种族、宗教和民族来源的角色》、乔治·伊顿·辛普森(George Eaton Simpson)和米尔顿·英格尔(J. Milton Yinger)合著的《种族与文化的少数群体——关于偏见与歧视的研究》(*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An Analysis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和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我最先开始动手翻译的，是辛普森和英格尔合著的《种族与文化的少数群体》。2012年春天我在波士顿访问的三个月期间，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译这本书。也许是年龄的原因，也许是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多个学科同时篇幅太大，在翻译过程中自己颇感精力不济，三个月里只勉强译完了全书18章中的前7章，考虑到手边还有必须完成的其他事，我只好调整自己的工作计划，决定把后半部分的9章委托给我已毕业的一个学生继续完成，以便能够把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到翻译戈登这本书的工作上来。

正巧2012年秋季台湾中研院的王明珂教授访问北京，见面时我曾向他提起是否有可能短期到台湾访问一事，他这几年正在台湾中兴大学兼职，表示愿意安排邀请我来中兴大学访问三个月，我当时心里的计划就是利用这三个月的时间来翻译戈登的这本书。中兴大学位于台中市的南区，远离台北的中研院和其他大学，所以相对比较清静，可以专心做事。到了4月底，这本书的各章

基本译完，这项工作可告一段落。尽管我对自己的译文并不满意，各类错误在所难免，每次重读必有修订之处，但是终于接近尾声，很快即可发给译林出版社进入编辑程序。因此这本书的排版付印，很可能要在辛普森和英格尔的那本大书之前了。至于另外那本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认同》一书的翻译，我也计划委托我的另一名学生来做。无论如何，我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即开始做的这个翻译英文族群研究经典著作的梦，到今天总算是看到了一点曙光，可以部分释怀了。我最应该感谢的，自然还是刘东教授，没有他的大力推荐，恐怕此事至今还是没有眉目。同时我还要特别感谢译林出版社，出版这三本译著也许并不能给出版社带来多少效益，但是它们在促进中国民族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工作方面所发挥出来的作用，决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我只能说“功德无量”这四个字。

下面对于戈登的这本书再多讲几句话。

作为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族群的移民国家，美国如何在这些历史、语言和文化传统差别极大的多元化人群中建立“美利坚民族”的凝聚力，如何化解历史上遗留、累积下来的种族矛盾和族群隔阂，这是独立后许多美国政治家和学者长期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也就不会有一个统一和强大的美国。戈登这本书围绕着美国各族群的同化和融合问题从理论和政策方面来进行分析和讨论，苦苦探索和发掘美国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凝聚因素、凝聚框架和凝聚力量，寻找构建美利坚民族的“正能量”，期望美国的族群“亚社会”的问题最终能够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解决途径。他把许多全新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思路引入美国种族和族群问题研究的理论视野之中，这正是这位资深社会学家的勇于创新之处。

纵观全书，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戈登教授不仅是一位有着深刻历史洞察力的睿智学者，而且是一位深深关切美国族群关系未来良性发展的善良的人，他从内心企盼每一个美国人（包括黑人和所有少数族群的成员们）都能够与白人共享美国的社会理想和民主制度，都能够享有真正平等和最完全的公民权。在书中讨论美国新教徒中的极端宗教排外主义的倾向时，戈登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一封信中写下的话：“在我看来，我们堕落的速度真的很快。最初，我们宣称‘所有的人生来平等’并以此成为一个民族（nation）。现在我们在实践中把这句话读作‘所有的人生来平等，但是黑人除外’。当‘一无所知’（Know-Nothing）党徒们控制了国家时，这句话将被读作‘所有的人生来平等，但是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除外’。当这一切发生时，我将选择移民去其他至少不会虚伪地装作热爱自由的国家例如俄国，在那里君主专制是公开和纯粹的，没有掺杂着虚伪”。在这段话中，我们读出了坚持废除奴隶制的林肯总统对于民主、平等和自由理想的热切追求和他对族群民族主义者的极端鄙视，也感悟到戈登教授对这一理念的充分肯定和推崇。

中国今天也面临着严峻的民族关系问题，2008 年拉萨的“3·14 事件”和 2009 年乌鲁木齐的“7·5 事件”就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身上最新出现的惨痛伤痕。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持续地经历了多个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分割，山河破碎、骨肉分离，各族民众几代人所期待的就是和平、平等、和谐、繁荣的幸福生活。1949 年后，外国势力彻底离开了中国，我们再也见不到洋兵洋警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经济体制变迁的反复探索后，我们的日子逐渐好起来了，但是在社会的迅速发展和经济活动的拓展中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各种社会矛盾和群体冲突，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发展进程中都不可避免的。仔细读一读美国史，20 世纪 60 年代席卷全美一百多个城市的“黑色风暴”依然会使我们感到触目惊心。面对中国当前在民族关系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应当静下心来，不慌不乱，一方面深入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社会调查，以完全开放的态度和虚心学习的心态来倾听当地各族干部、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对于我们各项制度、政策和具体工作的看法和意见，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满足民众的合理需求并从根本上加强民族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还需要拓展视野，从世界各国特别是多种族、多族群国家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中吸取养料和智慧。别的国

家走过的弯路甚至翻车的覆辙，我们实在不应去重蹈，而那些经实践证明对改善族群关系有明显正面效果的经验和思路，我们为什么不去吸取？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而一个不善于从其他国家（甚至是自己过去的敌手）那里学习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

中国各民族有着几千年的交往合作的悠久历史，在近代历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各族人民也曾肩并肩地站在一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也曾长期彼此相互尊重、水乳交融、团结合作。我有信心在这样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和潜能，努力克服目前存在的一切不和谐的因素，让我们的各个民族重新走上团结合作的新历程。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最令我感慨的就是戈登教授在全书最后的结束语：“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人们在这个社会里可以并排站在一起，以同等的自豪并毫无顾虑地说：‘我是一个犹太人，（或者是）一个天主教徒，一个新教徒，一个黑人，一个印第安人，一个东方人，一个波多黎各人’；‘我是一个美国人’，还有‘**我是一个人**’”。

我希望我们中国各族成员们有一天也能够并排站在一起，以同等的自豪并毫无顾虑地说：“我是一个藏族人，（或者是）一个维吾尔族人，一个蒙古族人，一个朝鲜族人，一个彝族人，一个满族人，一个汉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最后，“**我是一个人**”！

马戎

2013年4月30日

台中市 中兴大学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178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